



暴风雨中的火车头



江苏人民出版社

暴风雨中的火车头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工人斗争史)

1898—1949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史編輯委员会 編著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一五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三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张 3 1/2 插 5 字数 67 000

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三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100

责任编辑：杨家祥 刘蕊文 孙 一

插图：柯 明

封面设计：胡世德

责任编辑：饶敏珩

序

戚墅堰機車車輛工厂，自从一八九八年在上海吳淞建厂起，到今天，已有六十三年历史了。在解放前的五十一年中，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三十九年间，这个工厂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由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又达三十六年之久。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侵占戚墅堰后，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下，工人度过了三年多的苦难生活。这五十一年，是辛酸的艰难的五十一年，也是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五十一年。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戚墅堰機車車輛工厂的工人，和全国工人一样，在向国内外敌人作顽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一九二五年，厂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此以后，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工人们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逐渐把自己锻炼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戚墅堰地区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工厂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全厂职工精神焕发，欢欣鼓舞，一面积极恢复生产，赶修機車車輛支援解放军，解

放全国；一面协助政府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在三年恢复整顿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全厂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十多年来，特别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厂职工以忘我的劳动、冲天的干劲，制造出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结束了该厂只修不造的历史，跨进了机车制造业的大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铁道运输，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继承革命传统，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斗志，鼓舞更大的革命干劲，我厂厂史编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合作，发动全厂职工群众，写出三千余篇素材，经过调查研究和整理，写成这本厂史。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室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这本厂史还有不少缺点，希望读者批评指教。

中国共产党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委员会

一九六一年七月

目 录

战斗在吴淞(一八九八年——一九三七年)

- 苦难的“龙头厂”..... 1
- 革命风暴的洗礼.....12
-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18
- 反对包工制.....29
- 打击敌人的军运.....33
- 换汤不换药.....35
- 迁厂.....38

在日、伪、蒋夹击中战斗(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

- 在铁蹄下.....43
- 换了招牌.....48
- 团结就是力量.....51
- 错综复杂的斗争.....54
- 瘫痪它! 拖垮它!57
-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64

黎明前的战斗(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

- “接收”内幕.....67
- “考工”真相.....71
- 辛酸的生活.....73
- 生产能力“增长”的秘密.....77
- 在白色恐怖下.....82
- 二月大罢工.....87
- 护厂迎解放..... 100

战斗在吴淞

(一八九八年——一九三七年)

苦难的“龙头厂”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的前身，是一个修配所。原厂址在吴淞，老工人称它为吴淞机厂老厂。

吴淞机厂老厂，是一八九八年清政府以官款建成淞沪铁路后，为了装配机车车辆和应付日常的車輛修理而设立的。最初厂址设在吴淞张华浜，那时只有三间前阔后狭的铅皮房子。当时全厂只有三、四十个工人，设备也很简陋。看得上眼的不过是三只炉灶和靠近铅皮墙壁的十只老虎钳台。绝大部分的生产都是手工操作。

谈起这座江南最早的“龙头厂”（江南人把机车叫做龙头）的发展，应追溯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后的情况。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更多的特权，进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当时，帝国主义相互竞争，投资修筑铁路是他们侵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通过投资修筑铁路，夺取铁路的修筑权与经营权，控制铁路沿线的土地和资源，掠夺高额利润，贪得无厌地、残酷地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

建筑淞沪铁路的清政府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是一个为英美垄断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大买办。一八九八年，盛宣怀与英国签订了沪宁铁路借款合同草约，承认英国的借款权，并拟将淞沪铁路作为抵押品。

一九〇一年，盛宣怀积极扩建吴淞机厂的厂房，亲自到张华浜、蕴藻浜一带察看地形，指派张华浜人周某圈收民田。当时那一带的土地每亩价格一般都在一、二百元左右，但是盛宣怀公布一道命令，以每亩六十元的低价，强夺农民的大片土地，使无数农民流离失所。

随着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的扩张，沪宁铁路的主权逐步落入英帝国主义之手。一九〇三年七月九日，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代表在上海正式签订“沪宁铁路借款合同”，并将一八九八年草约作废。正式合同条件更为苛刻，它规定借款总数不得超过三百二十五万英镑，年利五厘，分五十年偿还；除了将已经建成的淞沪铁路作为抵押品以外，合同中还规定：营造铁路所用的地基、有关物料、车辆、房屋等项产业，以及以后所建成的铁路本身及该路各项进款，亦一并抵押；合同还规定设立沪宁铁路总管理处，设置办事人员五名，其中中国籍人员两名，由督办大臣选派，英国籍人员三名（包括总工程师在内），由银公司选派，如遇中英人员意见不合，则由督办大臣与银公司的驻华代理人会同商酌办理；总管理处得推荐“有职衔并才干合宜”的中国人担任铁路上的职务；合同的第二十三款规定：“现有之淞沪铁路接授之价值一经议定银钱已备交总公司之时，该铁路应即行转交归入沪宁铁路……。”由于

这些规定，整个铁路的建筑权与经营管理权，尽在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一九〇四年十月九日（农历九月初一），铁路总公司收回工价银一百万两，淞沪铁路正式和沪宁铁路合并了。当时的吴淞机厂，也随之成为沪宁铁路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为英帝国主义控制。

吴淞机厂新厂房于一九〇四年落成，前后花了三年时间。其实，所谓新厂房，也不过是用红砖、木材和铅皮砌造的结构简单的厂房而已。新厂址设于蕴藻浜和张华浜之间，前临铁路，背倚黄浦江；厂左边两里左右有一跨江大桥，是火车通炮台湾必经之路。这一时期，掌握工厂大权的是英国人滕斯顿和卜扑等人。

吴淞机厂新厂房，仅有一号厂（钳工）、二号厂（车工）、三号厂（打铁、刨工）、四号厂（客车）和五号厂（油漆）等五个厂房，设备非常简陋。所有的机具设备，就连极普通的螺丝，也是远涉重洋运来的英国货。当时，修理机客车所需要的大小配件，全是向英国顺昌洋行买来的，而所谓修造客车，不过是将买来的客车重装一下，添造座位而已。这充分暴露了工厂当时的买办性和附庸性。

工人们在英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的欺凌压榨下，生活极为贫困，谁也提不起劲干活，工厂的生产能力很低。以修理机车为例，大修一辆，要一年左右；中修一辆，要两个月；小修一辆，要一个星期。

一九〇七年，工厂又添建了一些厂房，连同原有的在内，

共有：裝修機車工場、機器工場、打鐵工場、動力房、鍋爐房、裝修油漆車輛工場、翻砂工場、鋸木工場和材料廠等。在生產設備方面，據不完全的統計，有：

設備名稱	台數	設備名稱	台數
握盤銼機	3	蒸汽引擎	1
車輪銼機	2	臥式鍋爐	2
旋臂銼機	2	刨機	2
定形銼機	2	定形銼機	1
螺型銼機	1	銼機	4
磨機	1	水力壓輪機	1
通用銑床	1	剪沖機	1
磨光機	1	大汽錘	1
切管銼機	1	直銼機	1
盤形刀架銼機	1	木工帶鋸	1
滾銼機	1	木工刨機	1
架空起重機	2	鑽木刨機	1
旋樞起重機	1	小圓鋸	1
直流電動機	12(內200匹馬力2台)		

當然，這些機具設備，也都是來自英國的。一九〇八年，滬寧鐵路正式通車，為了適應這一需要，工人的數量也隨之增加了。據資料記載，當時有工人二百零六人。這時，工廠才算初具規模。

就在這一年，工廠在黃浦江邊建造碼頭一座，接通軌道，直接裝卸外洋來的機器、材料以及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大量傾銷的商品。

一九〇九年，江苏省的沪嘉铁路和浙江省的杭嘉铁路（即后来的沪杭甬铁路）工竣通车，所有机车车辆也完全由吴淞机厂修配。直到一九二一年，闸口机厂建成，沪嘉铁路和杭嘉铁路的修造机车车辆的任务，才移归闸口机厂。

据记载，一九二二年以后，工厂的生产设备续有增添。置有起重三六点六公吨吊车一座，螺旋机等亦有所增添。一九二四年，吴淞机厂工人增加至七百四十七人（在包工制奴役下的临时工未统计在内）。

为了通过沪宁铁路掠夺中国人民更多的财富，英帝国主义牢牢地抓住沪宁铁路（后来的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的心脏——吴淞机厂。在新厂房建成以后，掌握全厂大权的，先后有芬茨和毛尔维等英国佬；其中要算毛尔维担任厂长的时间最久，直到一九三四年三月才离职。前后三十六年，整个工厂为英帝国主义统治着。

当时，工厂的管理制度极其腐朽。除了“洋厂长”外，各工场的生产都归工头指挥，没有技术人员，在生产上，排列紊乱，漫无规章；如车辆工场与机器工场距离很远，工件运输耗时费工，修理技术上更是墨守陈规。

在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下的吴淞机厂，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一九三三年前后的一年中，工厂生产水平是：大修机车七辆、客车八辆、货车五十二辆，重造客车四辆。产品质量也不高，在毛尔维离职以前（一九三四年三月），当时沪宁线各主要机车牵引力极低：

机 車 类 别	牵 引 力 (吨)
B 字 机 車	950
C 字 机 車	410—510
D 字 机 車	1,500
E 字 机 車	510
F 字 机 車	調車不过100—200
G 字 机 車	810
部 字 机 車	1,300

由此可见，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資修筑铁路、开办工厂的目的，无非是对中国进行經濟掠夺；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說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經營了許多輕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經濟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① 吳淞机厂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一样，是腐朽的、落后的，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是没有独立发展前途的。

吳淞机厂的工人，在“洋厂长”和“土皇帝”(工头)的統治下，长年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把头的残酷剝削和压迫，因而工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性异常坚决。

“洋厂长”——英国人毛尔維，在新厂房兴建时期，还只是土木工程师的繪图样的助手，由于他压榨中国工人“有功”，得到上司賞識，当上厂长。工人们知道他的底細，所以背地里叫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頁。

他“小打样”。

“小打样”当了厂长以后，改变了用一个中国“总头脑”来管理工人的制度，把英国佬直接安插在工场中，各个工场另设“头脑”（工头）和“副头脑”。“小打样”还亲自驻厂，管理漆、木、机车等部门；冷作、打铁等部门先后由麦登、孟司菲尔特管理。“小打样”经常下工场巡视，任意打骂中国工人。他看到工人偶尔讲一句话或休息一下，就举起拳头乱打，提起脚来乱踢。油漆工场工人周荣生为了活命，打疟疾时还硬撑着上工。工友们相互照顾他，让他到车厢里休息。谁知道给“洋厂长”毛尔维和工头周长根发现了，毒打一頓，周荣生连病带伤，连吓带气，回去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当时工人上工，碰见洋人要向他们立正行礼，路走慢了，也会遭到洋人的责骂。工人们受了欺侮，表面上不敢反抗，心里却说：总有一天要斩断“猪脚爪”、“洋火腿”。

“小打样”还用罚工资和停工的办法，来压制中国工人。有一次，刘师傅上厕所去了，“小打样”不容分辩地扣罚了他一天工资；工友林阿大把两个车厢接头处的电丝槽做得稍微大一些，其实，只要用老虎钳钳一下，就同样顶用，可是被“小打样”撞见了，就硬说林阿大“拆烂污”，立刻停歇了他的“生意”。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是无孔不入的。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工人叫做“外国冬至”），“小打样”派工头和领班向全厂工人索取两天工资作“礼金”。圣诞节前，凶神恶煞似的“小打样”到各个工场乱窜，专找工人的岔子，目的是叫工人多送礼金，他好多捞“外快”。等到“外国冬至”的

“錫箔”燒過以後，“小打樣”來工場的次數就少些；就是來了也是一晃而過。當洋人們“衣錦還鄉”的時候，工人又倒了霉，各部門的工頭為了要孝敬洋人，就到處奔走，向每個工人勒索“禮金”。

“洋廠長”還利用封建把頭來統治中國工人。這些封建把頭，是外國資本家壓榨、奴役中國工人的爪牙，他們平時作威作福，如狼似虎，工人對他們有着刻骨的仇恨。

封建把頭倚仗着帝國主義的勢力，狐假虎威。他們索取賄賂，隨意敲詐工人，任意停工人的“生意”。在舊社會，勞動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連出賣苦力也不容易。“進廠難，難進廠”，每個老工人都親身嘗過這種滋味。老工人李桂元，在一九一六年花錢，托人好容易弄到了一封洋人的介紹信，他拿着這封信去見封建把頭，因為沒送“見面禮”，這個把頭就從中作梗，說他個子太矮，干不了活，不能進廠。第二年，這個把頭添了“貴子”，李桂元的娘東拼西湊借了十二塊銀洋，到上海定制了一副金鎖片送去，這個把頭收了，這樣就讓李桂元進了廠。

進了洋人和封建把頭統治的工廠當學徒，生活是極其痛苦的。學徒進廠，先要預備禮物，到工頭家裏去拜師傅。冷作間工頭收徒弟，就先要學徒到他家做洗衣服、帶孩子、挑水、拖地板、买菜等家庭雜務，在廠裏只是掛個空名，進廠時間很少。在學徒期間（三年或五年），除了飯錢和剃頭錢以外，所有勞動收入統統落入工頭的腰包里。有的工頭還用徒工來頂正式工人的名額，吞吃工資。當時，學徒就是這樣過着奴隸般的生活。

一般底工(基本工人)的景况，比学徒好不了多少。每到发工资时，工头就要向工人强收“月费”，按各人工资的多少，每人收三元到七元不等。逢年过节，工人还得给工头送礼。那个工人送的礼丰厚，工头就会在来年稍微加一点工资；那个工人没有送礼，就会戴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七灾八难，甚至“打破饭碗”。工人周耀庭月月收入难以维持一家生活，一连两次没向工头送礼，就被工头加上“磨洋工”的“罪名”，赶出厂去。工头是个二花脸，有时会对不送礼的工人说：“现在活少，没有事情做，你不要来，等有了活，再喊你来。”有些工人花钱“运动”一下，工头又会转过脸说：“现在活多了，你来上工吧！”

有些工头还用“标会”的办法来剥削工人。他们总是标“头会”，把得到的会钱拿去放债，借给生活困难的工人，进行残酷的重利盘剥；而受盘剥的工人，却是债台高筑，愈来愈穷。多数工人受愚弄，连“会本”也收不回。

有些工头利用各种封建迷信的组织，作为他们笼络工人、欺骗工人、剥削工人的工具。工头周阿宝组织一个“佛教居士林”，既吞吃了一百多个工人捐助的“功德费”，又利用宗教来麻醉工人，使工人把苦难归之于命运，逆来顺受，忍受剥削、压迫。工头张三毛组织了一个“救火会”，强迫他手下的八十多个工人加入，每晚都得去签名报到，否则就要挨骂或者停生意。类似这样性质的帮会还很多，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在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下，受包工制奴役的临时工的命

运最为悲惨。临时工和底工不同，底工是厂里的基本工人，名义上是不得随便辞歇的。临时工是由工头招雇来的，专门做工头从厂里包下来的活，受到层层剥削，生活完全没有保障。临时工做一天工，算一天钱，活少就无工可做。当时厂里的冷作工、木工、漆工、翻砂工，几乎全部都是临时工。现在修机車間的老师傅杨銀林，当时曾一連做了六年临时工。厂里虽然有着明文规定，說临时工滿六个月后可以轉为底工，但实际上是个大騙局。有些临时工将屆期滿，工头就借故把他們一脚踢开，另招一批新的临时工，工头却从中大发横財的。

“洋厂长”和工头，賽似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工人头上。当时，工人中流传着一首順口溜，反映出工人心头之恨。

“洋厂长”专横賽皇帝，工头凶残胜霸王，
好似大山压头頂，工人血汗都吸光，
但愿有日东风起，刮去烏云见曙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人的生命沒有保障。生病、因工負伤的工人非但沒有補貼，反而会因此失业。吳淞机厂的劳动条件很坏，工人大都在露天干活，夏天热得象火烧，冬天冷得牙床发抖；工场里沒有什么安全設備，經常发生工伤事故。如推輪子的工人张春江就被輪子轧死；工人朱阿康在操作时跌在車沟里，脑血直流，洋人见了却若无其事。有个五十岁的老鉚工沈师傅，在高空作业时从半空摔下来，伤势沉重，沒錢医治，“洋厂长”不理，当夜就死了。

工人受尽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憤怒的火焰在燃烧。工人們自发地采取“磨洋工”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巧妙地向

“洋厂长”和“土皇帝”展开斗争。

直到现在，大家还津津有味地谈着“巧打许帐房”的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工人们如何团结起来进行自发斗争。

在厂里的“把头”中，最坏的要算是许帐房了。帐房是算帐的，为了讨“洋厂长”的喜欢，许帐房却经常向车间里跑，监视工人劳动，找工人岔子。凡是看着他不顺眼的工人，便加油添醋地向洋主子报告。工人吃他亏的真不少。大家虽然恨他，但表面上谁也不敢得罪他。

有一年夏天，天气非常热，别说干活，就是穿着单衫坐一会，衣裳也会湿得象水浸过一样。许帐房偏偏在下午最热的时候下工场，东转转西转转，一转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天，他走到老郝的身旁，死盯着他的两只手，看看是否出力干活，老郝气极了，便放下手里的大锤，使劲拍身上的灰，灰尘象雾一样，冲向许帐房，气得他骂着走开了。老郝的行动，启发了大家：要让他早点滚开，就得想法治他。他一离开老郝，大家估计他一定要往炉子间去，陆师傅一个急转身，在通往炉子间去的二门的石条上涂上机油。果然不出所料，许帐房板着一张煞神一样的脸，一摇一摆地向二门走去。

“咔嚓！咣咚！啊唷——”

许帐房踏着机油滑倒了，摔了个四脚朝天，一副近视眼镜，抛在三步远的墙角下打碎了，陈炳林、陆师傅等人早已做好了准备，一看许帐房跌倒，大家蜂拥而上。

“许先生，你摔痛了没有？”

“許先生，这个門就象地獄一样黑，不好走吧。”

大家装模作样地七嘴八舌地問这問那，看他快要爬起来，有的拉手，有的捧头，有的干脆一把拉住他的胸襟，他还没站穩，大家把手一放，让他再来个倒栽葱。直到他連跌三次，大家才让他站住脚。

“許先生，你身上有很多灰。”

“許先生，让我来給你拍一下。”

“真可惜，这么好的衣服都弄脏啦。”

于是，大家又在許先生身上噼噼啪啪地重手重脚的拍起灰来，把手上的油、灰，痛快地往許帳房的身上揩，有的一面揩，一面打。刹时間，許帳房活象一只快要断气的“灰毛狗”。

大家觉得为他“服务”得差不多了，就停了手。等大家一松手，他头也没抬，弯着腰，一手擦着长袍，一手拎着那副破眼鏡，嘴里不断喊着“啊唷啊唷”，好象一只被砍断了尾巴的野狗，狼狽地逃跑了。

革命风暴的洗礼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一九一九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六三”以后，上海工人参加了斗争，发动罢工，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的工人坚决起来进行罢工斗争，使交通断絕，給全国以巨大影响。吳淞机厂工人对帝国主义、北洋軍閥政府和卖国賊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异常憤恨，組織十人团，响应全国工、学、商各界的游行示威，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举行罢工、

捐款，支援收回青島、收回膠濟鐵路的愛國運動。十人團還利用吃飯的時刻，召開會議，進行宣傳活動。工人們寫了無數“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抵制日貨”、“廢除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拒絕和約簽字”等標語，到處張貼；同時，散發油印傳單，不少不識字的工人，也爭先恐後地拿着傳單去問個究竟。反帝反封建的怒火燃遍全廠。工人們還推派代表到滬寧鐵路局交涉，要求拍電報給北洋軍閥政府表明態度。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北洋軍閥政府在全國人民的抗議和壓力下，下令批准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辭職的消息傳到上海以後，工人方才复工。

一九二〇年，滬寧一帶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和加緊搜刮，加上奸商投機，操縱市場，糧價飛漲，工人生活維持不下去了。滬寧鐵路上海機務段的司機、司爐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這次罷工獲得勝利後，吳淞機廠全廠五百多工人馬上行動起來，要求增加工資二成，星期日工資照發，並集體簽名，寫了一封請願書送給鐵路局。在這封請願書上，大家簽名時故意簽成圓形，以免遭受反動勢力迫害帶頭簽名的工人。經過工人們幾度交涉，“洋廠長”才答應例假工資照發，每天增加工資一角。這一次罷工鬥爭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廠工人的鬥爭信心。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全國鐵路工人的罷工鬥爭，有了黨的領導，方向明確，聲勢更為浩大。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黨的領導下，為爭取成立總工會、反對軍閥高壓政策爆發的政治大罷工，遭到了直系軍閥

吳佩孚的殘暴屠殺。當時，全國各鐵路工人、各工團、各群眾團體，積極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的鬥爭，紛紛舉行罷工或通電表示聲援。吳淞機廠也推派代表出席了在橫浜橋中央大禮堂召開的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鬥爭大會。當時，唐山鐵路工廠的工人派了兩位代表，偽裝成玩雜耍的人，躲開敵人爪牙的跟蹤，來到吳淞機廠附近，對工人宣傳“二七”罷工的政治意義，使大家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從而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就更加憤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舉行罷工是“犯罪”的行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訂了各種“暫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等規章，殘暴地壓制工人的正當要求。當時，上海護軍使何丰林為了鎮壓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宣布了特別戒嚴令，各種集會、結社一概禁止，即使商會、學生會也不准召開。報館、車站，明里有軍警把守，暗中還有密探監視，各工廠、鐵路也被武裝的軍警包圍，不許工人自由出入。這時，吳淞機廠的“洋廠長”和工頭們也對工人嚴加監視。這一切說明了國內外的反動派對日益壯大、日益覺醒的中國工人階級感到莫大的恐懼。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鐵路總工會在上海成立。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期間，上海總工會也在劉華、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的領導下成立。黨進一步加強了對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黨號召全上海人民起來實行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鬥爭，以進一步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行。這時，吳淞機廠的“洋

厂长”和工头們也一再对工人群众軟硬兼施地进行威胁和欺騙。可是，工人們在党的领导下組織起来，坚定地参加总罢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作頑强的斗争，給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五卅”运动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建立起来。铁路总工会的党組織为了建立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会，特派党员到吳淞机厂进行組織工作。当时厂內为白色恐怖所籠罩，工作开展受到很大限制。党派来的王凱同志首先与工人孙津川同志取得联系，借孙津川同志的家里召开會議，印发传单。在党的指示下，王凱同志在吳淞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学生从初办时的二十余人发展到二百余人；最后連附近的华丰紗厂、大中华紗厂、中国铁工厂等厂的工人也来夜校学习，学生人数增至五百余人。这时，孙津川同志又在徐家宅借了一所較大的房子作为校址。夜校每天晚上上两小时的課，教員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他們給工人們讲解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通过讲授“社会发展史”、“铁路发展史”，結合“五卅”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以后，不定期的小报——《铁路工人》办起来了，在吳淞鎮还办了一所小学，作为党組織工人运动的核心机构。党通过这些活动，向广大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工作和組織工作，培养了許多党的积极分子。

孙津川同志是厂里风閘間的鉗工，当他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以后，在一九二五年八月間，就被中共中央直

接领导的铁路独立支部吸收入党，从事铁路工运工作。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为全国人民谋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

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在吴淞机厂召开了七百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孙津川同志等担任委员，领导协进会的工作。协进会是党团结工人的群众性组织。党通过协进会，领导工人展开斗争。

协进会成立不久，孙津川同志根据党的指示，运用协进会的组织，领导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使小工每月增加八角，技工每月增加一元。又一次，工人因为生活负担太重，要求“放饬子”（增加工资），厂方不答应，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除了在厂内进行罢工而外，并由协进会向上海机务处联络，实行同盟罢工。这样一来，火车停驶，交通中断，反动统治者只得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又一次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就在这一年，吴淞机厂在中共吴淞区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支部，由孙津川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厂内共有王根作等十多个党员。党支部的建立，使厂内的斗争跨进了新的阶段。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更加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为了使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的斗争能够和全国大革命的形势相呼应，党组织了一个属于铁路总工会领导的地下工会——沪宁、沪杭甬铁路工会。为了使地下工会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上级党派余立亚同志在吴淞三一路创办了一个名叫

友誼社的俱樂部。這個俱樂部，表面上是娛樂場所，實際上是黨團結教育工人羣眾的地方。在那里，工人們可以閱讀進步書籍，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也可以通過文娛活動，加強思想感情上的聯系。這個俱樂部還編演了一些以“打倒軍閥、爭取自由平等”為內容的戲劇，來擴大革命的影響。

一九二六年“五卅”周年紀念日，吳淞機廠黨組織通過友誼社舉辦了一次游藝會，吸引社外的工人參加，發展社員；並通過游藝會演出節目的內容，向廣大工人進行教育。在這個會上，工人（友誼社社員）演出了幾個暴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壓迫中國工人的罪行、啟發工人階級覺悟的戲劇。戲演完時，反動警察二十餘人來干涉了，他們一面勒令游藝會停演；一面抄去友誼社社員名單，逮捕了負責友誼社的余立亞同志。不久，黨設法把余立亞同志營救出來。但在“四·一二”以後，蔣介石反動派又逮捕了余立亞同志。余立亞同志被捕後堅貞不屈，被反動派殘酷地殺害了。工人們無限悲痛地懷念余立亞同志，余立亞同志堅持鬥爭、光榮犧牲的英雄形象，永遠活在工人心中。工人對蔣介石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恨之入骨。

鬥爭還在繼續深入。當時，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和取消工頭、領班的月錢。黨組織印了傳單，散發到各車間，號召工人怠工。工人們團結一致，一見傳單，馬上就不干活了。“洋廠長”迫於眾怒，只好請工人派代表去談判。結果，工人每月工資增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不等。這一連串鬥爭的勝利，使工人認識到組織起來力量大，有了黨的領導，鬥爭就有了方向。吳淞機廠的黨組織，在鬥爭中進一步發展壯大了。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

在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军战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吴淞机厂工人和全上海的工人一道，写下了中国工人斗争史和铁路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间举行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军事上节节失败，他的部下浙江省省长夏超乘机宣布独立。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决定举行武装起义。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铁路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馬霍路（黄陂路）一个弄堂里召开代表大会，由赵世炎同志向出席大会的七、八十位代表传达了上级党关于工人支援北伐军和打击军阀的重要指示。会后，吴淞机厂代表回厂传达了党的指示，要求发动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配合北伐军的总攻击，破坏铁路，断绝敌人交通三昼夜，不让直鲁军阀联军的军用列车由南京开往江西前线。党支部根据这一指示，当晚召开支部会议，研究破坏铁路的具体办法。为了使铁路破坏后，不能马上修复，同时保障旅客的安全，决定：（一）不能破坏客车，要破坏货物列车；（二）要在军运线高坡，以及不能作附线的地方进行破坏；（三）在镇江站外扬旗的地方及上海张华浜支线地点破坏。此外，还决定派人察看地形，十六日开始行动。

十月十六日拂晓，天空飘着蒙蒙细雨，黄静山披着雨衣，

沿着鐵路慢慢地走着。表面上他是在值班，實際上他是在察看地形，找下手和集合的地方。

終於，他選中了由上海通往張華浜支綫的一處高坡。在距離這兒不到半里路的地方，有幾座墳場，路邊還有一條較深的小河，墳場可以做集合和埋伏的地方，小河可以用來沉埋鐵軌。但同時也發現敵人的崗哨增加了，敵人的防范加強了。

夜晚降臨了，雨雖然已經停止，但是天空卻顯得格外黑，一點亮光也沒有。這給黃靜山他們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九點鐘敲過以後，黃靜山悄悄地離開了吳淞西站旁的小屋，手里拿着電筒，往車站外的田間走去。不一會，就和老劉、趙祥生等會合。當他們走出不遠，忽見遠遠地閃出一道電筒光亮，黃靜山他們馬上跑到一堆葎草旁，在背光的一面隱蔽下來。電筒光處原來是一小队巡邏兵，直到他們走遠了，黃靜山等同志才出來，繼續繞着村莊走，免得被人發覺。

當他們迂回地穿過農戶村舍的時候，突然跳出一條狗。老劉趕快拿出一只肉包子，朝着狗扔去。狗嗅到肉味，衝住肉包子，一聲也不吭，夾着尾巴跑了。就這樣，他們迅速而安全地達到了目的地。黃靜山看看四周沒什麼動靜，就讓大家干起來。

正干得起勁，一列貨車開來。五個人俯伏在路旁低洼處，一動也不動，等列車去遠了，才慢慢地爬起來。這一系列貨車的通過，是意料之外的事，但也更有利於他們的工作。也就是說，在短時間內不會再有第二列車通過了。黃靜山很熟練地旋開螺絲，取下魚尾板。正當大家拿出渾身力氣，用特制的撬把它撬進鐵軌時，忽然小沈和老劉發出“隱蔽”的信號。黃靜山

他們迅速把魚尾板浮放在原處，四散伏在田里。隔了一会，只听得克察、克察脚步声由远而近，电筒光亮朝四面射着，原来是那队巡邏兵回来了。一个巡邏兵的脚步，差一点踩上浮放的魚尾板。正在千鈞一发的时刻，忽然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巡邏兵都朝着狗叫的方向走去了。

黃靜山他們直到听不见絲毫响声之后才走出来，紧张地撬起鉄軌，扔到河里。

大功告成了。

“洋厂长”毛尔維正在上海夜总会里搂着他的情妇兴致勃勃地跳舞的时候，两路局长办公室給他打来了电话，說一列軍車在鎮江翻了，要他赶快回厂調救援列車去鎮江搶救。毛尔維只得丢下情妇，調了一部单机，赶回厂去。

当单机进入张华浜支綫不久，突然天崩地塌的一声响，毛尔維被拋出車廂，单机出軌了，毛尔維的右額上高高的鼓起一个青块，笔挺的西装也成了飘飘的花蝴蝶，迎着寒风在他身上乱飞，平日恶狠狠的凶神，现在变成了“傻灶猪”。

毛尔維熬着剧痛，回到他的小洋房时，东方已經发白，他連忙指示手下的头目，先修好张华浜支綫，再派救援列車去鎮江。

这时天已大亮，老刘虽然一夜未睡，但因为非常兴奋，一早就来到了吳淞机厂。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領班来找他，要他随着救援列車去搶修张华浜支綫。他表面上滿口答应，爬上了救援列車，心里却盘算：昨天晚上脫的軌，今天还才是三天期限的第二天，如果这条支綫很快的修复，救援列車迅速开

往鎮江，任务就不能完成。怎么办呢？

車上总共有二十来个人，青年人占了一大半。到了出事地点，老刘就跟旁边的一个青年谈开了，告诉他昨天单机出轨，“洋厂长”摔伤了一条腿。工人们历年遭受“洋厂长”的欺压打骂，都深恨毛尔维，听说他摔伤了，这真是大快人心。积极分子小王接口说：“今天早上我还看见医生到他家去的。听说‘洋厂长’深夜回来是有紧急任务，所以今天才这么急着要我们抢修线路。我们修好了，他好报功，我们偏给他来个慢慢干。”这句话落在大家心上，大家手上就慢下来，无形中形成了怠工。手并没有闲着，就是土坑老填不满，筑路基、钉道钉全是敷衍了事。直干到下午，才把路轨接上，把单机弄起，放到铁轨上试一下。单机刚在新接好的线路上开动，只听“噗通”一声，又出轨了。一只轮子飞出去好远。钢轨和道钉都脱了出去，路基又坍塌了一大块。

天已渐渐黑下来，工头还打算要大家做下去，工人们不愿干，只好收工。

原来单机第二次出轨，是孙津川同志干的。孙津川同志在十六日晚上十点钟，在镇江山洞的西首，完成了破坏任务，亲眼看到一列军车翻车以后，赶到张华浜支线，察看破坏情况，看到很多人在抢修，又看到出轨的单机歪在路旁，就乘人不注意的时候，躲在车后，把一只轮子的轴箱弄松，致使单机第二次出轨。

支线的抢修工程，由于工人怠工，直到第三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才算完成。毛尔维命令工人连夜开出救援列车，工人借

口晚上開車有危險，不肯開車。毛爾維看着自己渾身綁着的綑帶，啞口無言。

斷絕滬寧、滬杭甬兩綫交通三天的任務光榮地完成了。它為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吹響了雄壯的前奏曲。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開始，上海總工會發出命令：上海工人全體總同盟罷工。罷工人數達到三十六萬，堅持四天以上。這次大規模的罷工，表現了上海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和組織力量的加強。吳淞機廠工人亦積極參加罷工。帝國主義和軍閥孫傳芳互相勾結，在總罷工開始後，對工人實行了殘酷的鎮壓。帝國主義軍隊任意橫行，孫傳芳軍隊也可以進入租界捕殺工人。學生、市民因散發或閱讀傳單，也慘遭斬首或槍決。為了避免工人和市民的無辜犧牲，工人們在上海總工會提出的“養精蓄銳準備更大的鬥爭”的號召下復工。

雖然在兩次武裝起義中，上海工人受到了殘酷的鎮壓，但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工人們仍以最大的毅力和勇氣，準備更大規模的第三次武裝起義。這時，黨更廣泛、更深入地動員和組織工人和其他的廣大勞動群眾加入戰鬥。在武裝起義前十天，黨發動了鐵路工人舉行罷工，阻止軍閥張宗昌運兵支援上海的軍閥。黨除了進行巨大的政治工作外，並組織了工人糾察隊五千人，準備大規模的戰鬥。滬寧、滬杭甬兩路工會接受了上海總工會的命令，以孫津川同志為首，組成了滬寧鐵路罷工委員會，籌劃罷工的準備工作。

為了使罷工期間工人生活不受影響，吳淞機廠工人在黨

的领导下，在三月五日（星期六）那天，首先要求厂长提前一天发放工资（本来是每月六日发工资的）。工人们领得工资后，当天下午各车间贴出“罢工响应北伐军”、“打倒军阀”、“打倒毛尔维”、“洋厂长滚出去”等标语，开始罢工。为了防止反动警察捕捉工人上工，罢工委员会事先在八仙桥八仙坊（在当时的法租界）租好房子，动员工人去住。参加罢工的工人每天都可领到四角钱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总工会发下来的。当时法租界上的巡捕虽然曾来干涉，但阻止不了工人的罢工斗争。

铁路工人破坏直鲁联军的军事运输，对敌人的威胁最大。为了给敌人致命的一击，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总工会发出指示，一定要发动两路工人全体罢工。罢工委员会派孙津川等党员同志分头去发动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一起行动。这时，反动军阀也作了防范，对逃出的工人严密监视。孙津川同志到了南站龙头房附近，见敌人封锁很紧，实在无法进去。这时正巧开来一辆煤渣车，他就绕到龙头房外的线路上，打了个招呼，跳上空煤车，和倒煤渣的工人一道进了龙头房。

在龙头房里，孙津川同志通过他的老朋友，假充检修机车，就在车旁开了一个罢工动员大会，进行宣传鼓动。龙头房工人听吴淞机厂已开始行动，立即响应。龙头房瘫痪了。

接着，西车站和北站工人也行动起来，车站上的装卸工人也参加了罢工。

铁路工人的罢工队伍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到了十二日，直鲁联军的运输完全被破坏了。十五日，沪杭甬铁路工人也全部参加了罢工，约有数十台机车无人驾驶，弄得反动军阀焦头

烂額，只好到处找些“白俄”机匠来開車。针对这一情况，罢工委员会立即又組織一些人，将真如和徐家汇两地的鉄軌拆掉。使整个鉄路交通綫完全瘫痪了。

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和破坏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給上海八十万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三月二十一日，北伐軍占領上海近郊的龙华。就在这一天的清晨，上海总工会发出了总罢工的命令，规定在正午十二时开始罢工。各工厂、作坊、机关、商店等单位的职工紛紛涌向街心，向預定的地点集合。参加这次罢工的职工达八十万人之多。

当天，在党的领导下，两路罢工委员会集合罢工期間組織訓練的工人糾察队和吳淞机厂工人組織的鉄棒队、榔头队和拳头队，共六百多人（其中有吳淞机厂工人二百多名，組成鉄路大队，孙津川同志任总指揮，黃靜山、刘德全等同志担任中队长），准备武装起义。下午一时，全上海工人开始行动了。鉄路大队按照总工会的指示，分成了三队，一队向南市进发，另两队分往閘北、吳淞。当时，吳淞机厂工人手中只有两支枪，但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摩拳擦掌地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沒有武器，到敌人那里去拿！”

上海八十万工人群众怒吼了，鉄路被截断，电话局、电报局也被工人占領了，电灯、自来水立刻中断。徒手的工人群众紛紛夺得了武器，狠狠地打击敌人。吳淞机厂向南市急进的工人糾察队，每个人都藏着一面旗子，每十个人編成一个小队，

按照原定计划分头进攻预定的地区，当时联系的口令是：“罢——工！”一部分参加攻打警察局的工人刚到目的地，华商电车公司工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机厂工人迅速绕到警察局的门口，周阿毛、崇明阿小等四人，潜至敌人岗哨的背后，把哨兵紧紧抱住，夺了他的长枪和子弹。埋伏在左边的工人把手榴弹丢向警察局，跟着冲了进去。警察局里的十几个警察，只好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求饶：“革……命……军……军……我们缴枪！”

吴淞机厂的另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在孙津川同志的率领下，配合主攻部队——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攻打高昌庙军阀李宝璋的司令部。高昌庙司令部防守很严，有两道门岗。队伍走近敌司令部的时候，突然从敌司令部里开出一辆小汽车，孙津川同志立即向头道门岗哨兵射击，曾在敌司令部当过守卫的一个纠察队员名叫长青，乘机夺取了另一个哨兵的枪支。埋伏在外面的工人群众，一听见枪响，蜂拥而上，截住汽车。敌司令部的第二道门岗想还击，又怕误伤坐在小汽车里的两个长官，于是就向门里逃。工人们把两个敌军官从小汽车里拖出来绑了，押着他们，冲入敌司令部，敌人有的吓得翻墙跑了，有的朝桌下、床下、厕所里乱钻；持枪顽抗的，都被武装起义的工人打死或打伤。战斗很快地胜利结束。

还有一部分吴淞机厂工人参加攻打高昌庙兵工厂，他们赶到那里时，敌人的据点已被其他工厂的工人拿下，他们就接受新的任务，攻下南站龙头房，夺得了火车头。工人立刻升火开出一列列车到三十一号桥，准备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南市仅仅在四小时内，就被革命工人掌握了。

至于整个吳淞地区，工人们也在同一个时间里实行武装起义，围歼反动派駐軍，夺取枪械，很快地取得胜利。在战斗中，刘德全帶領的一队糾察队还捉到一个敵軍的參謀长，当场就把他鎮压了。

在上海七个武装起义的地区中，敌人負隅頑抗，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閘北。敌人在那里的据点多至二十多处，其中又以北火車站、湖州会館、商务印书館俱乐部等六个地点的敌人最为頑固。吳淞机厂参加攻打北站的工人糾察队，因为英国鬼子在租界上筑滿工事，于是决定繞道前进。一队繞到虬江路，先用假手榴弹攻下警察局，然后由海宁路轉进；另一队从广东戏館翻过了来阳里的墙头，突破英国鬼子的封鎖綫，向东站进发。当时，整个閘北区巷战激烈，盘据在北站的张宗昌等軍閥的大炮对市鎮猛烈轰击，“白俄”軍和英国鬼子的鉄甲車也对工人轰击。激战到二十二日下午，最后工人集中主力，猛攻了一个小时，才将敌人击潰。

在工人糾察队又一次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王桂荣接受爆破任务，拿着步枪，带着手榴弹，身子貼着地面，悄悄地向敌人工事爬去。战场上的硝烟和迷蒙的殘雾为他做了天然的掩护。他避过敌人的枪口，逐渐爬到敌人工事旁边，忽然“噹噹噹”一梭子子弹朝他打来。他赶紧往旁边一滚，地下激起了一层尘土和一片弹窝。原来一个敌人发现了他，他連忙閃到低洼的地方，脱下了一件外衣，把衣服用枪尖挑着，从地面拖过去，“噹噹噹”、“噹噹噹”枪弹象雨点一样的向衣服上射来。王桂荣把衣服抛在地上，从身边拿出三个手榴弹，結成一束，

迅速地奔向敌人工事，奋力朝工事内一丢。只听得“轰隆”一声，砂石乱飞，工事内的机枪变成了哑巴。紧接着又是“轰隆”的一声巨响，他的伙伴小沈的爆破也成功了。纠察队乘机高喊着冲锋，军阀部队仓皇朝宝山路逃去，来不及逃的，都高高地举起了枪支，跪求饶命。工人占领了北站。

雾已退去，但恼人的细雨又飘飘忽忽地下了起来。王桂荣一看敌人朝宝山路逃跑，紧跟着从后面追去。他咬紧牙关，端着枪，边追边打。“啪！”一个敌人倒下了，接着“啪啪”又倒下了一个。王桂荣正追得高兴，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座碉堡，他立即弯下身子，匍匐着朝碉堡爬去。

一面小白旗从碉堡的窗洞中伸出来，来回摇晃着。“妈的，你到底投降了！”王桂荣兴奋地站起来，快步向碉堡奔去，嘴里高声喊着：“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噍噍噍”一排机关枪象撒豆一样横扫过王桂荣的胸前，这位二十四岁的打铁工人怔了一怔，倒下了。吴淞机厂优秀的共产党员王桂荣，误中了敌人假投降的毒计，壮烈牺牲了。

跟在后面赶来的小沈，看到这种情景，眼睛发红了，复仇的怒火燃遍他的全身。他趁着敌人正在庆幸得计之际，奋不顾身地冲到碉堡下面，一连扔出两个手榴弹，消灭了这一帮毒蛇。

六时左右，工人纠察队完全占领北站，直到此时，北伐军才赶到，俘虏了一些溃兵。盘据上海的军阀终于被工人们击败。这个帝国主义侵略东方和中国的基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英勇搏斗下，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怀

抱中。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会委员长孙津川同志立即下令：铁路工人首先复工。由三百个工人组成的交通队，积极修复铁路，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

三月二十八日，两路工会公开了，并召开大会，选出孙津川等五人为常务委员，继续领导铁路工人进行斗争；同时，工人推派代表出席了吴淞的区民代表会。这时，“洋厂长”已逃之夭夭，工人们们在厂里举行大会，公审破坏罢工的工贼。

在帝国主义的利诱下，蒋介石在四月十二日，公然叛变革命，他一面命令各省实行所谓“清党”，残酷地杀害共产党人；一面在上海镇压起义的工人。

这一天，反动派收买的流氓，冒充工人，在上海工人纠察队集中的地方进行武装挑衅。接着，反动军队就来收缴“双方”的枪械。

反动派使出了各种卑鄙狠毒的伎俩，暗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四月十二日早晨，天空落着细雨，吴淞机厂工人纠察队被一部特放的单机接到上海，说是开大会去。到了天通庵，吴淞机厂工人被带到湖州会馆。这时，里面已有不少背着枪的工人坐在黄泥地上，广场一边有一座很高的台子，大门口架着五挺机枪。反动派第五团团长邢露如先把吴淞机厂纠察队总指挥骗了出去，接着下命令要工人放下枪械，大家感到不对头。突然间，高台上吹起了洋号，一些坏蛋们涌进来收枪，工人们立刻抢上去保护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武器。顿时机关枪

响起；許多工人兄弟倒了下去。活着的工人憤怒得眼睛里都冒出了火来，为了保存实力，大家一决儿冲了出去。

上海工人得訊后，立即罢工支援，游行抗議。反动派一面在宝山路口开枪射击請愿群众，一面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

“四·一二”后的十多天，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会也遭到敌人的包围，正在开会的十七个委员被捕，藏起来的七十多条枪和整箱的手榴弹也被敌人查抄了去。后来，孙津川同志也被反动派逮捕，由于党发动了四千铁路工人罢工和签名抗議，才迫使沪宁、沪杭甬两路局局长和厂长把他保释出来。孙津川同志出獄后，党把孙津川同志調离上海。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又逮捕了孙津川同志（当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用尽一切威胁、利誘手段，施用了老虎凳、灌洋油等各种酷刑，孙津川同志始終坚貞不屈。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清晨，孙津川同志在南京雨花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中牺牲了。

孙津川同志是工人階級的优秀儿子，是吳淞机厂工人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当吳淞机厂工人得知孙津川同志被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万分悲痛，万分憤怒，一致表示：血債一定要用血来还！

反对包工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轉入低潮，反动派的魅影又重新籠罩全厂。在工人起义期間逃走的“洋厂长”和“头

脑”也回来了。

一九二八年初，为反动派操纵的黄色工会——沪宁、沪杭甬两路职工会成立了，吴淞机厂也設了分会。很多工人遭到失业的威胁和被迫逃亡。

当时，吴淞机厂党组织轉入地下，继续领导工人，利用时机，采用各种形式，不屈不挠地与反动派进行斗争。

那时，包工制是压在工人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党就运用工人自发组织的关帝会、兄弟会等，教育、发动这些组织的成员，起来反对包工制和黄色工会。一九二八年十月，兄弟会拥有一百多个会员，分为十五个小组，又成立了主席团。由于党加强了领导，它成为反对包工制和反对黄色工会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吴淞机厂的翻砂、冷作、木工、油漆、打铁等部门，历来都有包工制。其中要算翻砂工场的工头对包工制下的临时工的剥削压榨最为残酷。

斗争就从这里开始。

一九二八年十月，翻砂间工头单荣生借端开除了杨阿毛等三个工资较高的工人，激起了翻砂间工人的愤怒，于是自动怠工、要求工头恢复杨阿毛等三人工作。翻砂间办公室的門象牢門一样关得紧紧的。工人们都围在外面，喊着要单工头滚出来。老半天，单工头象縮头烏龟一样，賴在里面不肯出来。

工人们去找黄色工会，翻砂車間黄色工会的副主席李麻皮走出了工会办公室，神气活现地向工人說：“你们是包工的，不属于铁路工人，我們工会不管！”他的話还没讲完，工人们一齐哄了起来：

“包工不是工人嗎？”

“你們有良心沒有？”

这个麻皮一看工人們的来勢很凶，沒敢再說二句話，就想溜之大吉。可剛一掉轉頭，便被一个工人抓住后領頭拉了回来：“你想往哪里去？”

“你們不是說要向厂方交涉嗎？我这就去打電話啊！”工人們信了他。这家伙一进屋就从后門溜跑了。

工人一看工会不管，就向工統会写了呈文，控告单工头違反協定，无故开除工人。工統会又把呈文退回到翻砂間，这下可把工人气坏了。

工人們挽袖捏拳，怒氣滿臉找到了单工头，你推我架地把他拉到工統会。在工統会，他不得不表面上答应工人們所提的要求，恢复楊師傅等三人的工作。等工人們一走，他从袋子里拿出支票，賄賂工統会的汪科长，另外送了四百元錢給翻砂車間的黃色工会副主席李麻皮，并勾結木匠間韓工头，使出了更毒辣的手段——从上海另招了一批新工人。

工人們听到单工头的陰謀后十分激怒，围住了办公室。老奸巨猾的单工头，早就从后門溜走了。工人們找不到单工头，又把李麻皮拖了出来。

一直鬧到下午七点钟，沒有解決問題，大家決定明早到厂門口集合，找单工头算帳。

党的組織通过“关帝会”支持翻砂車間工人的斗争，派代表与厂方交涉，以翻砂間的工人名义，发出“告全厂工人书”，說明包工头对工人的压迫，要求全厂工人維護自己的切身利

益，援助翻砂間工人。同时派人劝导新招进厂的工人停止工作。一种同阶级、同命运的情感发生了共鸣，新招进厂的工人，马上停下了工作，站到斗争的队伍里来。

“告全厂工人书”发出后，立刻得到冷作、油漆、木工等工场的响应，顿时罢工的风潮席卷全厂。各工场的工人也都排着队来到厂门口，汇成了一支巨大的游行队伍，口号声象巨雷一样地轰响。

经过多次的罢工斗争，反动派退让了，答应木工、漆工、冷作等工场的包工一律改为长工。只有翻砂間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因为单工头仗着他在吴淞的“老头子”（旧社会帮会组织的头子）的恶势力，不肯取消包工制。这次斗争就暂时结束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两路局要造三十四辆四等车和四辆二等卧车。厂里不敢公开复活包工制，就想了个办法，贴出布告，说这活谁都可以包，承包者在工成后可以得到一百元奖金；至于由谁来包，则用投标方式。

木工间韩工头想吞这块“肥肉”，就投了标。这件事传开后，木工间三百多工人，一致反对复活包工制，大家气愤极了，推选陆福等三人代表大伙向韩工头和路局交涉，质问他为什么要恢复包工制。

三个代表和韩工头交涉时，工头们看见他们人少，就纠合工贼，象疯狗一样涌来毒打三个工友。正在危急的时候，“关帝会”的李老大带着人赶来支援，救出了三个代表。

为了抗议工头们的暴行和反对复活包工制，全厂工人又

起来罢工了。

事情发生后，两路局特别党部派人来调解。经过一星期的斗争，路局深怕事态扩大，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取消这批活的包工办法，改由工人自己包作；连顽固保持包工制的翻砂车间也被迫取消包工制，对其他条件也作了一些让步。

斗争胜利了。压在工人头上二十多年的包工制，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厂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的威力下，被摧毁了。

打击敌人的军运

在全国革命高潮暂时转入低潮的期间，吴淞机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仍然进行着各种斗争。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被国民党C.C.派把持的京沪（沪宁铁路在一九二九年更名京沪铁路）、沪杭甬两路特别党部，为了与国民党政学系的局长黄伯樵争权夺利，操纵吴淞机厂黄色工会，进行改选。材料厂的事务员曹文魁“当选”为常务理事。曹文魁在国民党C.C.派的指示下，为了打击国民党政学系，在吴淞机厂群众大会上，公开揭发了当时路局总务处长兼材料处长莫衡在购买材料时私换商号、高价收买次货等贪污舞弊行为。莫衡用了一条调虎离山之计，把曹文魁调往宁波。国民党两路特别党部不甘示弱，指使两路黄色工会出面，煽动吴淞机厂工人挽留曹文魁，国民党两路特别党部还写了一批反对莫衡的标语，历数莫衡“背叛党国，破坏工运，营私舞弊”等罪状的宣言，在厂里张贴散发。一出狗咬狗的把戏开场了。

党组织研究了这种情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当时蒋

介石正集結一百万大軍，二百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大圍剿，而李濟深和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發動事變，在福建成立了反蔣政府。這時京滬、滬杭甬兩路的反動軍隊的軍運頻繁，形勢很緊張，反動派宣布淞滬戒嚴。因而，黨組織決定立即抓住敵人的內部矛盾，來牽制蔣介石反動派的軍運。於是積極鼓動工人反對莫衡，發動工人怠工。

十二月十九日，吳淞機廠工人開始怠工了，並表示一定要打倒莫衡。國民黨兩路特別黨部陷在迷魂陣里。他們發動國民黨兩路各級黨部和黃色工會來響應吳淞機廠工人的怠工。路局局長黃伯樵和副局長吳紹曾得知吳淞機廠怠工的消息後，立即召開總務、機務、材料各處負責人會議，商討應付辦法。怠工的头兩天，路局先後派了總務處副處長、機務處長、代機務處副處長、人事科科員等到廠“勸導”工人復工，但是毫無效果。二十一日，國民黨兩路特別黨部見事態擴大，不好收場，也派組織科主任、黃色工會常務理事等來廠召集工人開會，要工人在怠工中遵守秩序，听候處理，然而，同樣沒有效果。

吳淞機廠工人大規模的怠工，正打中了敵人的要害，南京國民黨政府大為震動，特派中央組織委員會代表及鐵道部參事等到上海進行“調處”，要工人先行復工，然後再處理問題。但工人則堅持先將莫衡撤職查辦，再行復工，使“調處”陷于僵局。二十三日，國民黨政府的代表會同路局、國民黨兩路特別黨部和黃色工會的有關頭目，到廠召集黃色工會幹事及各組組長等開會商討“解決辦法”。會上，黃色工會同意先叫工人復工，莫衡問題由“中央政府”調查，交鐵道部處理。可是國

民党两路特别党部要通过黄色工会叫工人收兵，那就困难重重了，怠工继续进行。

最后，路局公布铁道部处理莫衡案件的结果。对莫衡仅仅是“原控各点，查无证据，应予誥誡”。而对曹文魁则“由警备司令部……依法惩处”。布告中提到：“吴淞机厂、吴淞材料厂工人借故怠工至一星期之久，使本路损失巨大……当我中央政府正在讨伐閩逆……两路军事运输非常重要。……”工人们看到布告，知道怠工八天，已牵制了大局，阻止了反动军队的军运，内心莫不称快。

換湯不換藥

一九三四年三月，“洋厂长”毛尔維溼蛋了。四月一日，国民党任命陈福海正式接任厂长。自这时起，工厂结束了由“英国佬”担任厂长的历史阶段。可是，国民党統治者的手段依旧是十分残酷的。

陈福海任厂长以后，在工厂組織系統上作了調整。在厂长之下，設文书、工作、材料、帳务四股；在机器设备及具体生产方面，分設机車装配工场、机器工场、鍋炉工场、鍛鑄模型工场、車輛工场；工作、材料两股及各工场均由工程师担任主任技术員职务。一九三四年八月間，建立了厂务會議制度，每星期三召集各股、工场的負責人員以及各工场的工头举行厂务會議。根据一九三五年七月的資料記載，技术人員共二十七人，內机械工程师一人，机械帮工程师四人，电气工程师一人，鍋炉稽查員一人。經過調整，全厂組織力量和技术力量都較前增强了。

陈福海为了讨好他的上司，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和出勤率。如：在厂内设有专室，为监工与有关人员联系的处所；制定所谓各工场保荐小工及帮匠升考工匠办法；试行所谓计件工资制；制定年终考绩加薪和全年不请假另给奖金等办法。其中最为工人不满的是“翻砂工每月必须鑄出合用鑄件五万磅，如不及此数，须听凭路局处分”，以及以考察工人勤惰为名扣罚工资等残酷剥削制度。

这时，职工人数亦有增加。但是，大量增加的是临时工，原来包工制下的工人，也被转成临时工；而有底薪的正式工，工资却比以前路减，表面上说是为路局节省开支，实质上是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特别是对临时工的剥削。

一九三四年三月到一九三五年八月间，吴淞机厂的职工人数增长情况如下：

时 間 类 別	人 数	1934年 3 月	1935年 3 月	1935年 7 月	1935年 8 月
員 司		55	55	55	55
工 人		981	950	949	949
临 时 工		17	495	483	443

工人待遇也极不合理。据一九三五年三月的统计，正式工有九百五十人，工资总数为四万七千零七十元，平均每人每月为四十九元五角；临时工四百九十五人，工资总数为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元，平均每人每月为二十五元。正式工人的工资已经很低了，而临时工的工资仅仅只有正式工的一半。

陈福海还将一日一班制改为日夜两班制，以后又改为日夜三班制，而夜班添雇的临时工，每工仅仅发给一元一角至一元三角的工资。

不论正式工也好，临时工也好，生活都是极其贫困的。路局赡养储金管理委员会曾经打算在吴淞附近筹建工人住宅，出租给工人居住，租金每月最初定为二十元左右，后来又减低到每月十四元到十五元，结果没有一个工人登记预租，因为如此之高的房屋租金，几乎占到工人的月薪的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工人们仍然住在每月租金只花七、八元的民房中。当时，在铁路机厂中，吴淞机厂工人的工资还是最高的，其他工厂的工人生活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福海来厂后，为了扩大生产，对于全厂的生产设备，也作了一些添置和调整。至于生产情况，根据当时的资料，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三四年度生产情况如下：

車 別	數 量 年 度		1933年度	1934年度	比較增減之百分數
	大修或重造				
机 車	大 修		7 (輛)	31 (輛)	+343%
	重 造				
客 車	大 修		8 (輛)	39 (輛)	+387.5%
	重 造		4 (輛)	10 (輛)	+150%
貨 車	大 修		52 (輛)	40 (輛)	-23%
	重 造			62 (輛)	

(当时所谓机车大修，沒有一定的规格。凡机车必须上吊车进行修理的就叫大修，反之就叫小修。)

一九三五年四月以后机车的牵引力情况如下：

机 车 类 别	牵 引 力 (吨)
B 字 机 车	1,400
C 字 机 车	410—510
D 字 机 车	2,000
E 字 机 车	510
F 字 机 车	510
G 字 机 车	810
部 字 机 车	1,600—2,000

与“洋厂长”统治时期相比，吴淞机厂的机客车生产有所提高，B字、D字机车牵引力有所增加，但货车修理却下降了，C、E、F、G等机车牵引力仍维持原状。

两路局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规定吴淞机厂的生产任务是：每月大修机车二点五辆、客车十辆、货车二十四辆，又规定蒸汽机车至少每两年大修一次。陈福海为了报功，曾企图每月大修机车四辆，超额完成“局定”指标，但工人并不愿意为他卖命，工厂自一月至十二月“每月大修机车出厂仍为二辆”，大修马马虎虎，汽缸不圆也不重旋。这就是陈福海上任后生产扩大的真相。

迁 厂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卖国政府为了镇压革命，发动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使整个东北迅速

地淪入日寇鐵蹄之下。當時，上海工人組織了抗日救國聯合會和抗日義勇軍，吳淞機廠有三、四十個工人參加了抗日義勇軍，並在廠內外展開各項宣傳活動。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日，淞滬抗戰爆發了。三月七日，日寇占領吳淞機廠時，全廠工人離開工廠，沒有一個人留下來給日寇干活。

日寇將吳淞機廠作為司令部，鍋爐工場、打鐵工場等變成了日寇的宿舍，鑄鐵工場成了馬房，一切材料、機器都被日寇任意搗毀取用，木材、木器當了燃料。五月五日蔣介石與日寇簽訂了停戰協定，直到五月底，日寇才撤離吳淞機廠。在日寇占領期間，吳淞機廠遭受的破壞和損失相當嚴重。根據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計，共計折合“法幣”三十萬六千九百一十三元四角三分。

吳淞機廠是全國有數的幾個鐵路工廠之一，“一·二八”時，遭到日寇嚴重破壞，國民黨反動派為了保持它反共反人民的實力，為了打算對日寇作出更大的讓步，所以，決定把工廠遷離吳淞。在新廠址的選擇上，曾作了多次研究，有的主張遷無錫，有的主張遷蘇州，以便蘇嘉鐵路修成後，可以兼顧。但最後決定遷往戚墅堰。因為戚墅堰離南京、上海各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同時戚墅堰的發電廠可以就近供給電源。一九三六年八月，國民黨反動政府鐵路局正式下令遷廠。

決定遷廠以後，工人們認識到這是國民黨反動派準備對日寇讓步的一個措施。雖然國民黨反動派採取投降主義態度，但工廠設在吳淞，確實有隨時被破壞的可能；因而，工人雖然

对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非常不满，但激于爱国义愤，还是积极地投入了迁厂工作。

迁厂工作，自八月份开始。迁厂的步骤是：在戚墅堰先造货车制造工场及锻铁工场，然后拆迁在吴淞的装配、锅炉两工场。客车、油漆两工场暂时留在吴淞，作为代其他铁路装配由外洋购来的客货车之用。新厂除了机车工场的厂房和旧机械工场的铁皮房是商人承包的以外，其余的厂房都是工人自己建造的。工人们把厂里的机器悉数拆迁，把厂房的钢梁、房架和柱脚也装车运走。但在这次迁厂中，厂长陈福海却大发横财。他利用迁厂的时机与商人勾结，谎报建造费用，贪污了很大一笔款子。仅仅承包商送给他一辆小汽车和座落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幢洋房，就很可观。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工厂行政部门名义上驻戚墅堰工作，实际仍在上海。一九三七年一月，新厂址已装好一部分机器，并开始修理机车，工人近二百人。二月间，工厂划归铁道部总机厂管辖。八月份，迁厂工作全部完成，新厂规模较吴淞机厂为大，共建成机车、锅炉、老客车、货车（一）、机械、锻冶、锯木、锅炉间、动力室等厂房各一幢，高水塔一座，工房二十幢，职工约一千五百余人，每月可大修机车三台。

迁厂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上海就沦陷了。在这时局紧张关头，厂长陈福海宣布：王金林等二十五个迁来戚墅堰的临时工留职停薪。这批临时工工作了两个月，却连一文遣散费也不发。全厂职工见临时工拖老带小，啼饥号寒，实在心酸。有个工人为此作了一首诗：

局长厂长喜洋洋， 出入汽车住楼房；
哪管工人死和活， 一脚踢开心如狼。

对残酷的统治者，只有展开斗争。临时工在气愤之下，推出王阿英等两人为代表，提出“坚决要求复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口号，向厂长交涉。厂里的工人也纷纷支援他们。大家采用疲劳战术和厂长周旋，今天三个人，明天五个人，后天全部，轮番地在厂长室门前说理。厂长看到有大多数工人作他们的后盾，只得假意地答应让他们到南京复工。

二十多个临时工拖儿带女，忍饥挨冻地前往南京。可是到了南京机务段，一见门口贴的布告就楞住了。原来在布告上写着：“所有临时工，一律遣散。十一月份以前雇用的临时工发两个月的遣散费，十一月份以后工作的一律不发。”大家又失望、又愤怒，连夜赶到陈福海家里去交涉。这个老奸巨猾的厂长起先是声色俱厉地对待工人，并用电话喊来一队荷枪实弹的铁路警务队来恫吓。但是临时工并未被吓倒，还是坚决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直到第二天清晨五时，陈福海逼得没有办法，才被迫答应发给每人安家费十二元，并允许一齐复工。

在上海战事日趋紧急时，陈福海要吴淞机厂原有工人全部迁往南京。最初，陈福海把工人分别安插在南京龙头房和浦镇铁路工厂工作。十一月间，苏州、无锡、常州先后沦陷，陈福海立即宣布全厂职工一律遣散。当时，老工人发两个月的工资，临时工分文不发。全厂一百七十多个临时工十分气愤，于是再找陈福海。工人们一见陈福海正在收拾行李箱笼，准备逃离南京，立刻上前把他团团围住。最后，陈福海迫于众怒，

只得发給每人一个半月的遣散費。

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政策下，工厂刚刚拆迁到戚墅堰，結果还是給日寇占領了。只有一小部分机器，在一九三七年八月間由南京运过长江，繞道津浦、隴海、平汉、粵汉各綫迁往湖南株州。工厂里的技术工人，則被一脚踢开，置之不顧。

在日、伪、蔣夹击中战斗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

在鉄蹄下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蔣介石继续执行妥协投降政策，十一月十一日，上海终于淪陷。接着江苏各地先后淪陷，威厂也在十一月間为日寇占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寇組織华中軍用鉄道局，由日寇鉄道兵团接管了京沪、沪杭甬两路全綫。一九三八年初，日寇林木三郎来厂。当时厂內职工全部离厂，日寇就一面在附近强抓壮丁充当工人，一面叫伪保长强派“苦力”，逐日輪流来厂上工。后来，日寇就将这些“苦力”留了下来，当作牛馬、奴隶使用。

日本鬼子占領了工厂后，在厂門口的三条通道口設立了三道卡哨，每座卡哨上站着一、二个手执馬刀大枪，脚穿皮靴的鬼子，他們叉着两条矮矮的圓腿，瞪着死魚样的眼，活象凶神一般。在他們的脚边，坐着张嘴露牙的狼犬，眼睛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嘴里的唾液不住地滴在地上。进厂的工人，走到門口，就得规规矩矩地鞠个九十度的躬，稍微馬虎点，就給你吃“火腿”、“大餅”(拳打脚踢)、枪柄；进厂迟了，不管天雨下

雪，必得双膝跪下，磕上几十个响头，一直到鬼子发了“慈悲”，才得进厂。放工出厂，工人要排好队，等候鬼子抄身，行动稍慢，或是队形不齐，就要挨打。要是抄出“公物”来，轻则遭到毒打，重则被狼狗噬咬，或是送往警备队受刑。因此工人们称厂门口叫“阎王关”、“鬼门关”、“尖刀关”。

当时，工人们曾编了首八句头的山歌，来描写“鬼门关”：

朝进鬼门关，	如上尖刀山；
稍一不留神，	饱尝恶鬼拳。
晚出鬼门关，	心惊又胆战；
抄出“公物”来，	阴间吃晚饭。

日寇还在各个工场的最高处，筑了了望台，来监视工人的行动。

那时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大打三、六、九，小打天天有。”最可恶的是，在严冬，日寇将工人的衣服剥光，强迫工人站在露天底下受冻，甚至还在工人的头上浇冷水，冻僵了的工人还被残暴地拖走。

日寇在厂内驻有警备队，队址就设在现在的货车车间旁边。这是一个魔窟，无数工人牺牲在这里。

日寇为了监视工人的行动，收买了一些民族败类，组成密探队，到处找工人的“岔子”，工人们常常无缘无故地被关进警备队受刑。警备队的“老虎凳”坏了，还要强迫货车工场木工来修理。

恐怖、黑暗，阴森森地笼罩着工厂，工房里不时地传出工人失踪的消息。被逮捕的工人，有的受尽了酷刑，遍体鳞

份，释放出来后，甚至丧失了劳动力。现在制材車間的錢林度同志，当时在用品庫做工，一次庫內少了三个鉛元宝，日寇硬說是他拿的，把他捉到常州密探队审問，对他施用灌冷水、坐老虎凳等刑罰以后，还用狼狗把他咬得鮮血直淋，至今手臂上伤疤犹在。有的工人一去无踪。工人家属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看见自己的亲人放工回来，一顆心才落下来。然而，誰也不能担保，夜晚会不会又有意外发生。有一次，一个名叫馬场的日寇領班，帶領了几个日寇，就在现在紧靠制材車間的运河边上，强扣了一条民船，船上的錢財全被搜刮去，三十多个中国人也全被日寇用馬刀杀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寇在厂里进行了一次全厂性的大逮捕（这是第一次大逮捕），使全厂陷于极度恐怖之中。当时，全厂有一千人左右，日寇采取了分批抓、分地抓的阴险手段，捉去了一、二百人。有的工人在做工时被叫了进去，就沒有出来；有的工人在放工回家的路上被捉了去；有的在宿舍中被日寇逮捕。被捕的工人都被关在技工养成所（即现在的貨車車間与第一保健站之間）。

在日寇的审訊室里，墙上挂着麻绳、皮鞭、木棒、竹扁担、橡皮管、水壶，地上摆着老虎凳；日寇軍官杀气騰騰地坐在房子中央，士兵和翻譯站在一旁。日寇把工人逮捕后，首先严刑拷問工人是不是中国兵。如现在在总二办公室备品倉庫工作的蔣和同志，在被审問中，就被日寇高举起来，从半空中摔下去，一連摔了七、八个筋斗，被摔得昏迷了过去。甦醒以后，又被灌冷水，坐“老虎凳”，第二天还受电刑。这不过是这次大

逮捕中受酷刑的一个例子而已。

尽管日寇如此残暴，却并不能在中国工人口里得到“口供”。因而日寇又把这批被捕的工人送到常州去做苦工。

距第一次大逮捕不过一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日寇又在工厂里进行第二次大逮捕。由于国民党军统戚厂情报组的特务告密，我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武进青年抗日救国团（简称“青抗”），原是一九三九年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在党组织领导下所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当澄（江阴）、锡（无锡）、武（武进）三线抗战委员会（简称“三抗”）成立后，“青抗”即归“三抗”领导。在常州车站北面的沟头村开会时被日寇破坏了，厂里被逮捕了不少工人。被捕的工人被送到上海，其中一部分又被转送到南通，或是遭到屠杀，或是被判处徒刑，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日寇的折磨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是极其悲惨的。日寇刚占领工厂时，被拉来的工人根本没有工资，做一天活给军用票一钱（一百钱合军用票一元）和一顿午饭，谈不上养家活口。日寇为了防范工人逃走，宣布：凡是逃走的工人一经抓回，即行枪决，以此来威胁工人。后来对工人的待遇曾作了两次“调整”，每月发军用票五元和面粉半袋。军用票本来就是日寇掠夺沦陷区物资的工具，表面上与日币等价，实际上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一九四〇年三月，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组织所谓汪记“国民政府”，工厂改发储备票。工人每日所得，折合实物，不过五、六合米。同时，由于日寇与汉奸的搜刮，物价飞涨，储备票大

跌。日寇为了維持軍用生产，一般工人每月工資“調整”为四十元，另外配給一点面粉、大米等实物。配給的面粉是倉庫底下各种霉烂的粮食混合而成的，里面有泥、石子，甚至还有短头发；大米也是掺有許多砂子，霉烂不堪。日寇配給实物还有严格的规定：一个月停工三天的减发实物若干，停工一星期的则全部取消。工人拿到这样微薄的工資，还要受到日寇头目和中国工头的剝削。发了工資，如果工人不送禮打点，就会有意外的灾难飞来；至少是受到扣掉配給物品的懲罰。工人挨餓更是常事。每天能有一点米加些野菜煮一頓稀粥，就算不錯了。当时工人終日愁柴愁米，有人做詩說：

日本鬼子侵略来， 又无米面又无柴。

白天做工夜发愁， 明天伙食哪里来？

至于穿衣，当时人口少的工人，都无法添換衣衫了，人口多的工人，更是衣不蔽体。

现在我厂的火車头体育场，就是一九四四年工人宿舍的原址。說起宿舍，更是辛酸。那时的房屋是稀疏的瓦頂，煤渣地，竹片作牆，竹竿作柱，薄薄一层芦苇就是間隔板。这样簡陋的宿舍，每戶也只能攤到一間，烧飯、睡覺都在一处；遇到刮大风，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險；一落雨，屋內无一处不漏。严冬寒夜，刺骨的西北风侵入室內，更是使人无法入睡。

当时，工厂的劳动条件也极为恶劣。打铁工场沒有通风設備，炉子里燃着熊熊烈火，烤炙着工人。加上活儿重，营养缺乏，有些工人支持不了，就昏倒在机器旁边。工厂里又沒有防护設備，工伤事故层出不穷。伤势輕的，日寇逼着你继续作活，

伤势重的，就一脚踢出厂門。落雨天在高空作业，一棒下来，就是粉身碎骨。一九四〇年五月間，工人吳传海在改装炼鋼炉衬，由于六千六百伏特的油开关接头沒有防护設備，不小心誤触在高压綫上，眼前火光一閃，就失去了知觉，醒来一看，一只左手已燒得不成样子了。当时厂里虽說有医疗所，但根本不是为工人医病治伤的。

在日寇惨无人道的迫害与压榨下，工厂成了一座“杀人场”，也是一部巨大的吮吸工人血汗的机器。然而，厂里工人坚信，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总有一天要失败的。

換了招牌

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南京“維新政府”行政院在日寇导演下，与日寇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签订了所謂关于华中鐵道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协定。规定新的华中鐵道株式会社有經營华中鐵路的全权，其范围除了有京沪、沪杭甬两路以外，还包括津浦路的南段、宁蕪路和浙贛路的东段。表面上看，鐵路的所有权属于“維新政府”，实际上“維新政府”是无权过問鐵路。日寇这一措施，不过是掩耳盜鈴，把鐵路从日寇軍閥手里轉移到日寇財閥手里而已。从这时起，工厂就由所謂“軍管理时期”轉到所謂“华中鐵道株式会社常州工场”时期(简称“华鉄时期”)。換上“华鉄”招牌，这原是个大騙局。日寇的軍事恐怖統治并未結束，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〇年底的两次大逮捕，就是在換上“华鉄”的招牌以后进行的。可是日寇却挂着这块招牌，欺騙工人，說鐵路是“中国固有”的，中国

人應該“愛護”鐵路，並且用“調整工資”，發“補貼”、“獎工”等小恩小惠來麻痹工人。

在“華鐵時期”，工廠的重要職務仍然和“軍管理時期”一樣，都由日寇擔任，先後來任工場長（廠長）的有佐藤、松山、野村等人，原來日寇鐵道兵團派來的人員，大部仍留在廠里工作。在工場長（後又增設副工場長）下，分設下列各個部分：

本場——下設庶務、車輛、設備、副營四課。

現場——分設車輛、機械兩系。車輛系管轄機關車、客車、貨車、制罐等工場（日本帝國主義稱職場）；機械系管轄鍛冶、鑄物、機械、工機、電機、內燃機、工具等工場。副營工場則直屬工場長。另設用品庫、預備品倉庫及運搬科。

工廠的直屬單位有通成分場、上海駐在所（上海自動車修繕所）、生計所、技工養成所。另有一個直屬華中鐵道株式會社管理的醫務室。

在工場設職場長（主任）綜理工場事務，設助理為職場長的佐理，下設技術、作業兩股。

刺刀和鞭子不能使中國工人俯首聽命；殺戮和迫害等高压政策也不能消滅工人戰鬥意志，於是日寇又採取所謂“攻心戰術”，大肆宣傳“中日親善”，企圖毒化職工。工廠總辦公室每天上班時，各課由日寇課長率領全課職員宣讀什麼“興亞奉公，和衷協同，士魂商才，勤勞盡職”的華中鐵道株式會社“社訓”。要中國職員勤勞盡職，具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和經商的才能，與日寇“和衷共濟”，“奉公守法”，共同為“繁榮東亞”而努力。同時，又對中國職員實行分而治

之，分为什么“社員”、“雇員”等几个等級，每一級之間待遇和工資悬殊很大，以此来分化职工，破坏团结。在工场里的墙壁上还贴上什么“我們必須学习邻国的語言”等标語，强迫工人学日語，說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应“相互提携”、“繁荣东亚”。

由日寇豢养的一小撮为虎作倭的密探队，不仅在“华铁时期”被保留下来，而且被扩大了。

日寇还对青年进行法西斯的奴化教育。一九三九年秋天，工厂附設的技工养成所，在常州地区招收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青年，规定訓練两年半。在訓練期間，供給衣食，外加津貼，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各个工场充当正式技工。技工养成所先后办了六期，每期訓練內容是相同的。学徒工入所以后，进厂学习和課堂学习都有专人監視。宿舍里有日本舍监和中国舍监。起床后要点名，如果鈕子还未扣好，就要被舍监打耳光，而且打一下还要立正一次，动一动就多打几下。整队后要面向东方，向日寇天皇遙拜“致敬”，吃飯前要說一句：“飯是天皇恩賜的。”头半年是預科，在教室內一律要用日語讲话。日寇特別重視修身課和公民課，灌輸“中日亲善”、“天皇神圣”、“建設大东亚共荣圈”等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来毒害青年。还有教練課（进行法西斯軍事訓練），教員由中尉級日本軍官担任。日寇还以严格的等級制度来分化各期的学徒。如預科生见了本科生要敬礼，服飾及生活待遇上，也都有区别。

在“华铁时期”，日寇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高压手段和欺詐手段，奴役工人，压迫工人，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企图以此

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征服不了的，顽强的斗争到处在展开着。蕴藏在工人心头的怒火，随时会向敌人烧去。

团结就是力量

尽管日寇对工人的统治极其残暴和极其阴险毒辣，但是，厂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四月，新四军江南部队开入京沪铁路两旁，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在丹阳、高淳、江阴、武进等地区活动的有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江南游击挺进纵队。党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并派了干部去，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斗争。

日寇的兵力和据点只是分布在铁路沿线。铁路四周，便是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厂里工人散居四乡。由于新四军向来与工人有着乡亲血肉联系，因而新四军的抗日行动，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厂内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工人杨木匠因为拿了厂里一小块锈铁纱，给日寇关在警备队，准备送往常州枪毙，这件事情，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怒，爆发了营救杨木匠的斗争。在放工时，各个工场的工人都集中在厂门口，提出抗议，表示：“不释放杨木匠，就不离厂。”斗争持续了六小时，距日寇所谓“行刑”的时候愈来愈近，“决不能让日寇杀死杨木匠！”成了工人的一致呼声，“不放人，不回去！不上工！”的口号响彻云霄。日寇厂长出来了，工

人們一涌而上，把日寇厂长包围起来，他害怕了，不得不向大家担保：明天释放杨木匠，不然，就不干这厂长。

第二天，全厂工人又排在厂門外。誰知杨木匠在暴风雨的夜里被人救走了，日寇厂长交不出人。工人齐声叫道：不放杨木匠，不上工！日寇厂长在怒火高烧的工人面前，无計可施，只好将看管杨木匠的日本兵当众揍了一頓。这时，传来了杨木匠已脱險的消息，工人们才趁勢收兵，結束了斗争。

当工人们在日本寇軍事恐怖和高压政策下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工厂里的国民党特务和地方上的流氓却勾結起来，搞什么“地下軍”，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工人的抗日活动。一九三九年年底，国民党的“地下軍”头子丧尽天良地向日寇告密，日寇便疯狂地来了个全厂性的大逮捕。当被捕的工人将送往常州做苦工的消息传出以后，六百多个工人家属在共产党地下組織发动下，涌到工厂門口，抗議日寇的暴行，营救自己的亲人。日寇企图用刺刀、棍棒把他們拦在門外，可是憤怒的人群还是象怒涛似地涌进厂去。日寇用自来水龙头冲击他們，但他們拦住汽車不让开，高呼：“不准乱抓人！”日寇开枪恐吓，他們也不肯后退一步。日寇見勢不妙，只好把汽車从后門开走。

被押送到常州去做苦工的工人，知道为敌人修鉄絲网，就是帮助敌人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因此，虽然日寇監視很严，有的背着枪，有的拿着皮鞭，有的在巡視，但是工人们仍然是頑强地进行斗争。他們在接电路时，故意接錯，使电流不通；在埋木桩时，只埋短短的一截，用雪压一压就算完事。这样的鉄絲

网，只要用劲一推，就会倒塌。

没有被日寇逮捕去的工人，为了支持工人家属抗议日寇乱抓工人，在极端恐怖的情况下也联合起来，拒不上工，使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迫使日寇不得不向工人提出不再抓人的“保证”，并将押往常州的工人全部释放回厂。

一九四〇年，党的外围组织——“青抗”，与工厂联系十分密切。“青抗”派同志进入工厂，积极开展组织工作，至十月份已发展了八十多个团员。其中机械、打铁等工场参加的人最多。厂内还设有“青抗”支部和小组。他们经常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抗日的意义、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人暴行。他们有组织地、秘密地把党的抗日宣传品分送到各个工场，或是贴在墙上，甚至在厂里的保险箱上，也经常发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人团结起来”等等标语。“青抗”的活动使日寇终日惶惶不安。

在“青抗”的积极活动下，工人们懂得：谁为敌人多干一分活，谁就为敌人增加一分屠杀自己同胞的力量。因此，个个消极怠工，只要日寇和他的爪牙一转身，大家就丢下工具不干活。有的工人还利用厂里的原材料，做自己的私活；有的则索性蹲在待修锅炉的水箱里打纸牌，或是躺在大木箱里睡觉。工人们还把翻砂工场南边的矮厕所作为聚会的地方，研究打击敌人的策略。当时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你去聊天我望风，	我做私活你帮工。
工具箱里睡大觉，	厕所里面谈“武松”。
各个工场真安静，	人人学会磨洋工。

鬼子进门鄧头响， 鬼子一走各西东。

在党领导下，工人們的抗日斗争情緒日益高涨，采用各种巧妙的斗争方法，来狠狠地打击敌人！

錯綜复杂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爆发前后，党在苏南的抗日力量，处于日、伪、蒋三方面的夹击之中。从这时起，厂里的对敌斗争也就更加复杂艰巨了。

在“皖南事变”以后，日寇与汪伪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清乡”，还勾結蒋介石军队，妄想进一步消灭我苏南、苏北地区的革命力量。当时，常州、无錫、江阴間的三角地带，是日伪所謂重点的“清乡区”。戚墅堰在铁路綫上，是日寇的重要軍事据点。当时日寇在厂里駐了大約一营的兵力，专门指揮这个地区的“清乡”活动；东青鎮和橫山桥也駐有一定数量的日寇，以东青鎮为“清乡試驗区”。在戚墅堰、东青鎮和橫山桥又駐有伪軍。日寇在铁路沿綫还筑有又闊又深的护路沟，并装上了鉄絲网，同时，又在附近筑有碉堡。厂內也有汉奸的特务組織，专门跟我党地下組織和进步工人作对。此外，附近还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忠义救国軍，专门偷袭新四軍。这时，党加强了厂內的对敌斗争的領導，不断地派遣共产党员来厂，困結广大工人，从工厂內部打击日寇。当时，日寇在厂內的密探队扩大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汪伪的特务組織以及一些封建性的帮会組織也在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我党地下组织采取了“蔭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开展革命活动。

“皖南事变”前后，先后来戚墅堰和工厂工作的有“江抗”党组织、沪东党组织和属于中共苏中五地委领导的中共澄西县委等派来的党员同志。“江抗”派来的同志与原在戚墅堰工作的同志取得联系后，曾在镇上建立组织，坚持了一年多。

一九四一年初，中共澄西县委为了加强对工厂的领导，派党员同志来厂，以乡土关系和亲戚关系隐蔽在工人中展开活动。一方面搜集敌人的情报，配合厂外武装斗争；一方面启发工人破坏敌人的生产，拖垮敌人。党首先对工人们宣传：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团结的罪行。党从政治上团结群众，从生活上关心工人。如日寇杀人，党就发动工人对被难家属进行慰问；遇有工伤死亡事故发生，党就支持工人提出抚恤家属和撤换场长的要求；工人生活困难，党就启发工人群众进行争取增加工资、房贴、米贴等的斗争。这样，不仅随时揭露了敌人的凶残，也维护了群众的基本利益，团结了工人群众，同时也孤立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党的深入宣传教育下，工人群众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提高了，因而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经常地、主动地反映敌人的动态和厂里生产上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日伪的“清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残酷。国民党反动派的忠义救国军也到处杀人放火，设卡征税，抓人夺粮。他们还冒充新四军，妄想嫁祸于人。在这一年，中共苏中五地委成立了铁道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铁路工人的领导，对铁路工厂提出了对敌斗争的方针：从各个方面发展力量，搞敌

人的軍事情報，配合厂外的武装力量打击敌人。中共澄西县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瓦解敌人，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新生社。新生社是群众性的抗日团体，成员主要是工人，其中也有一些是可以争取的伪保甲长。这样既可扩大政治影响，了解地方情况，又能分化敌人。参加新生社的工人，受到党的教育，更加拥护党的主张，不少人成为党的情报员，为新四军带路，补充枪械零件，甚至还把枪支带到工厂里来修理。

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伪军的“清乡”。为了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提出了“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持打日寇，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争取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惩罚了一些鱼肉人民、无恶不作的土匪、恶霸和反动军队的头子。由于扫除了抗日道路上的障碍，得到基本群众的热情拥护，一部分中上层分子，也支持党的抗日斗争。当时，戚墅堰附近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国民党， 不打鬼子乘风凉；
新四军，打东洋， 恩情赛似爹和娘！

在这种形势下，工人愈来愈多的要求参加革命，参加抗日。一九四二年年底，工人与铁路南面的新四军取得联系，回厂以后，即组织十人团和民兵小组，以过去吃日寇苦头很深和觉悟高的工人为发展对象。

一九四三年，抗日形势有了新的进展，部分地区展开了反攻。厂里的革命力量，也得到新的发展。沪东党组织派来

的同志，并动员青年工人到抗日根据地工作，或是参加新四军。为了扩大抗日影响，中共澄西县委组织厂里工人十余人，分两批到苏北根据地参观。党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了对工人的抗日宣传和前途教育。于是十人团、民兵小组等组织积极地介绍工人参加新四军，为新四军传递情报，进行散发宣传品等等抗日活动。

就在这一年，在中共澄西县委的领导下，党的另一个外围组织——兄弟会成立了，又增加了一份抗日力量。

一九四四年，党在工厂中吸收了优秀工人入党，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同时，厂里的兄弟会等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厂虽然处在日寇的控制之下，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厂内的工人与厂外的农民呼吸相连；厂外人民的武装斗争与厂内的秘密斗争，内外呼应。工人群众的心向着共产党，对日寇展开各式各样的斗争。工厂成为党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就象一把巨大的锋利的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

瘫痪它！拖垮它！

在这一时期，工厂对敌斗争的重要的一面，是继续进行各项破坏活动，不让工厂正常生产，从生产上瘫痪它，拖垮它。

日寇占领工厂以后，为了使工厂为其侵略战争服务，进一步地掠夺沦陷区的财力物力和榨取工人的血汗，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间，日寇在工厂拼拼凑凑的增加了一些厂房和设备：

一九三九年——添建鋸木工場磨鋸齒間、材料倉庫一幢；
一九四〇年——添建翻砂工場出砂間，副營舊軋鋼工場，水泵間，
一九四一年——添建總辦公室，貨車第二及工具工場，風閘修理間，副營第一工場及辦公室，副營(一)鍋爐間、制釘場，副營(二)氣氣工場、通用門及翻砂工場方棚間。

一九四一年年底，日寇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夢想與德寇一舉征服全世界。日寇這一夢想不但未能如願以償，相反的，自此以後，在侵略戰爭的泥坑里，却愈陷愈深，用來支持侵略戰爭的物資也愈來愈困難了。針對這一情況，黨提出了：“日寇缺什麼，就破壞什麼”的口號，領導廠內工人進行鬥爭。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工廠里的潤滑油脂就已經非常缺乏，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來源更加稀少。這時日寇在各個工場的周圍，都貼着中文和日文的標語：“一滴油脂一滴血。”這就充分暴露了日寇的弱點。工人們便用盡心機製造油脂和其他材料的緊張局面。比如工人在領到干油後，乘日寇不注意，摻進黃砂，使油脂失去效用，有時趁機將油脂倒在煤屑里、陰溝里。

又如，在木材來源稀少、供應困難的情況下，工人故意踏壞修車用的板材，讓日寇當作取暖的燃料，或者有意將長料鋸短，然後報廢。此外，工人經常窩工和有意浪費原材料。有一次，四個工人拆一只機車汽缸，花了三天三夜時間，用了火油三箱。在修理機車時，大修一輛機車，往往拖上六、七個月。工人的這些鬥爭活動，確實使日寇大傷腦筋。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寇为了适应它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打算大批生产《31型货车，并准备以原有货车第二工场的设备搞金工生产，在横林建立年产一千辆货车的分厂。由于厂里工人的不断斗争，日寇的计划完全落了空。

此外，厂里工人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直接破坏生产设备，来瘫痪敌人的生产。

打水间的吴传海老师傅就曾两次巧妙地破坏生产，使日寇遭受重大损失。吴师傅是电工，负责管理打水间马达，马达是用电动的，电门一开，马达就转，不好磨洋工。打水间马达是给全场打水用的，是全厂动力之王，要是能把它搞出个毛病来，那全厂就要停工。吴师傅一直在想办法，和鬼子捣蛋。

有一天早上，他上班时路过职场长（主任）日本人杜部隆（绰号白毛）的办公室，看他正在和几个鬼子喝酒。吴师傅心里想：今天机会来了，因为白毛一喝酒，便对工作马马虎虎，特别是喝得起劲的时候，他更舍不得放下酒杯，非喝到烂醉不休。他一进打水间，就悄悄地把马达过线处的螺丝旋松，接着象平常一样地去报告白毛：

“太君，马达检查过了，情况正常。”

“唔，顶好的。”白毛只顾喝酒，猪似的哼了一声，指指门口说：“开路开路。”

到了中午，马达热得烫手，吴师傅镇静地跑去报告白毛：

“太君，马达有点儿发热。”

白毛这时喝酒喝得糊里糊涂，猪似的睡在沙发上，他挥了挥手赶走吴师傅。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吴师傅和往常一样，

在专门記載馬达使用情况的記錄簿上写道：“中午十一点二十五分，馬达微有发热，該情况已报告职场长。”写完，轉身走了。

下午三点钟左右，馬达的声音不对头了，水越抽越少，吳师傅的心越来越激动。为了不让变样的馬达声传出去，吳师傅赶快把打水間所有的窗門关起来，提起鉛桶去找白毛。一进门，只见白毛在办公室里和几个鬼子正在发酒疯鬧得起劲，吳师傅上去就說：

“太君，油沒有了，我到电气間去領点油。”

“喂！馬达怎样？”白毛随口問了一句。

“和上午一样，还在发热。”吳师傅鎮定地回答。

“好的，去領吧。馬达的要当心当心的！”

“当然，当然。”吳师傅点头答应，轉身就走。

吳师傅还没到电气間就听见汽笛响了，消防队打着“丁当！丁当！”的警钟往打水間跑去。打水間烧起来了。为了不致遭受鬼子迫害，吳师傅連忙跑回打水間挤在人群中装着救火。

馬达燒毀了，全厂停工两星期。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冬天。这一天特別冷，刺骨的西北风卷着雪片。吳师傅穿着一件破棉袄，冻得縮着脖子，两只手紧紧抱在胸口，快步走着。这些日子，吳师傅每天只能吃上四两重的黑面餅，却要干十几小时工，瘦得象根枯柴。这天吳师傅正在往厂里走，忽然听到前面有人在叫：

“你的快来，快快的过来！”

吳师傅猛抬头一看：原来又是那个狡猾的杜部隆，他墮着

一双老鼠眼睛，嘴里衔着一支香烟；在水塔下边转来转去。吴师傅只好耐着性子走过去。

“你的上去看看，水有的没有，满的不满！”

吴师傅只好忍住气，有气无力的象上刀山一样，一级一级往上爬。好容易爬到水塔顶上，吴师傅一手拉开塔门，看到水塔里的水不多了。这时吴师傅想出一个主意：我只要说水塔里的水是满的，骗过白毛，让炼钢炉照常开炉，这样因为水不多，就会使炼钢炉烧坏。打定主意，就很快地顺着铁梯爬下来。

白毛见到吴师傅下来，假惺惺的一笑说：“水有的没有？满的不满？”

吴师傅就笑嘻嘻地说：“太君，水大大的有，满满的。”

他听了后，把大拇指一伸：“你好好的，好好的！”说完后，就朝屋子里走去。

饭后，吴师傅照常到厂里去修理马达。不一会，便传来了炼钢炉因为水不够被烧坏的消息。吴师傅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

果然，不出吴师傅所料，白毛带着两个爪牙，象疯狗一样，气势汹汹地朝他走来，两只眼睛瞪得象电灯泡一样，站在吴师傅跟前，喊道：“你说的水大大的有，怎么炼钢炉烧坏？”这时，在场的工人都围上来。吴师傅向他敬了个礼说：“太君，我上去的时候，水是满满的。”白毛咬着牙：“八格呀囉！”（滚蛋）一记耳光打在吴师傅脸上。“你说谎！”

“太君，我怎么说谎？这么多时间，水被人用掉了，怎么能怪我呢？”吴师傅早就想好了对策，镇定地回答。这时，工人

們把他們团团围住，大家异口同声地說：“这不能怪老吳呀，你又沒有命令全厂停止用水。”

白毛知道理亏，又怕工人起哄，只好罵了声：“你的当心！大大的坏东西。”說完后，带着两个爪牙，挤出人群逃走了。

一次，常州車站的工人設法巧妙地将停在第三条鉄路綫上的一辆机車的汽門打开，使它与停在机調室門口的另一辆机車相撞，两辆机車都撞坏了。日寇还以为是机車汽門漏气引起的事故。

随着日寇侵略战争的节节失利，原材料的来源也愈来愈稀少，生产也愈来愈困难。这时厂里参加兄弟会的工人，就更加积极开展破坏物資的活动，来增加敌人的困难。敌人連石灰也缺乏。因为在厂里石灰窑工作的工人，誰也不肯为敌人干活，石头进去，还是石头出来。

厂里的十人团和民兵小组，經常在石灰窑集会，討論如何发动工人为新四軍放哨，在厂內如何进行宣传活动，如何将宣传品带进厂內，如何进行怠工等等。他們在轉送宣传品时，采用了“調虎离山”之計，在前門故意地制造事件，趁日寇注意力集中在前門时，宣传品就从后門进了工厂。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愈加重視鉄路机車車輛的修理。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日寇在厂里又拼拼湊湊地增添一些厂房和设备，最主要的有：

一九四二年——添建三吨汽錘工作场，电石工场，兴亚楼宿舍；

一九四三年——添建材料試驗所，电机工场，翻砂工场，新木型間，石灰倉庫，技工养成所宿舍；

一九四四年——添建制冰工場，毛竹工房二百八十間；

一九四五年——添建新軋鋼工場。

在抗日戰爭時期，工廠共有機關車、貨車、第一制罐、第二制罐、工機、機械、電機、鍛冶、鑄物、第一副營、第二副營等十二個工場，職工二千五百八十四人，其中中國工人二千三百多人，日籍職工為二百四十人。

根據當時的統計，自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個月間工廠生產的情況是：

機車修理二百九十七台，其中一般修（大修）五十台，中修六十一台，局修（小修）一百八十六台，客車修理二百六十一輛，其中一般修一百六十九輛，局修九十二輛，貨車修理二千八百八十五輛，其中一般修九百五十五輛，甲檢二百四十五輛，局修一千六百八十五輛；一九四四年鑄鋼全年平均每月生產二十八點五噸，鑄鐵全年平均每月生產四十八點二噸，鑄鋼全年平均每月生產七點五噸。副營生產月產量：氧氣五百四十立方，電石二百十五噸，生石灰六十噸，製冰三十噸，焦炭二百二十五噸，軋鋼四十噸，拉絲制釘二噸，鋸木二百立方米。

從生產設備和生產情況來看，在車輛修理上，一般地都超過了抗戰以前的水平。這是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特別是一九四四年以後，日寇的機車車輛損壞量愈來愈大，因此，就抓緊修理車輛的周期，於是生產數字急增。另一方面，工人們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地進行技術性的破壞活動，使修理的機車車輛出廠以後行駛不久，就要回廠復修。生產水平提高的秘密就在這裡。由此可見，日寇在工廠所鋪的攤子愈大，所遭受的打擊也就愈寬，背的包袱也就愈重。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

一九四五年四月，蘇聯紅軍攻克柏林，隨着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勝利，抗日戰爭已經處於最後勝利的前夕。這時，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同志指示：“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中共澄西縣委根據“七大”的精神，為擴大工廠附近地區的革命力量，並加強工廠工人對敵鬥爭的領導，成立了鐵道工作組，來咸豐堰工作。鐵道工作組首先在路北的後潘落腳，原有中共澄西縣委派在廠內工作的黨員同志，由鐵道工作組領導。

廠內的黨員同志，就在這一年四、五月間，去蘇北淮安附近參加華中職工代表大會。會上討論了如何更廣泛地團結職工，動員一切積極因素，配合大軍反攻。參加這次會議的黨員同志回廠以後，組織了職工分會，為迎接勝利做好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工作。而面臨崩潰前夕的日寇，既是恐懼，但又不甘心死亡，他們與廠內國民黨反動派、漢奸的特務組織勾結更緊，嚴密地注視着廠內革命力量，妄想作垂死的掙扎。

這時中共澄西縣委通過兄弟會的組織，在工廠附近建立和發展武裝力量。來廠的鐵道工作組的負責同志，也以後潘為中心，組織有廠里工人參加的武工隊，並成立了黨的組織。自此以後，路南和路北的黨組織聯系在一起，加強了對敵鬥爭的領導。在廠外的武裝鬥爭更是尖銳。日寇與偽軍往來於鎮江、無錫之間，加緊進行“掃蕩”與“清鄉”；忠義救國軍和國民

党江苏省政府保安队对革命力量的迫害活动也更加频繁。然而，群众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特别是当党接受群众要求，处死了无恶不作的伪乡长朱树生和后潘村伪保长潘高亭后，更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这里需要提一提后潘村武工队的潘家五兄弟。在党的领导下，潘荣仁同志兄弟五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四弟潘文彪同志是地下党员（现任戚厂党委副书记）。敌人对潘家弟兄恨之入骨，曾悬赏五十担大米捉潘荣仁、三十担大米捉潘文彪。但在群众掩护下，日伪阴谋始终无法实现。

为了扩大厂外武装力量，厂内参加兄弟会、民兵小组、十人团以及其他与党组织有联系的工人，纷纷起来搞日寇的原材料和武器。有的工人将搞来的子弹，含在嘴里，送出厂外；有的在党员同志的带头下，有组织地集体地在仓库里搞出大量的子弹，装在特制的有夹底的饭盒子里携带出厂。厂外人民武装的枪支损坏了，便设法送到厂内来修理和配换零件。党员同志还打通伪路警，将小型的马达、铁轨、电话机等转送给路北新四军。工厂实际上已经成为新四军的枪械修配所和材料仓库。

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还多次地破坏敌人的军运。有一次，工人和农民一起在丁甸与永安镇之间埋下炸弹，阻止了敌人一列军用車由镇江开出；还有一次，破坏了横林和戚墅堰之间的铁路。

为了从政治上瓦解敌人、打击敌人，为了鼓舞工人的斗争情绪，党的宣传工作也加强了，大量的宣传品，从四面八方送进厂内，连日寇的碉堡上有时也被贴上标语和传单。有一种印有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相片的红色小册子，最受工人欢迎，

就連有些日籍工人，看后也点头称贊。《苏中报》則是經常大量的送到厂內，成为工人的精神食粮。在厂內，党所組織的要求增加工資、房貼、米貼的斗爭，越来越頻繁，越来越紧张。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工人一些生活上的要求，同时，也分散了日寇的注意力，使我們搞武器、搞情报的工作更为方便。

党还教导厂里的党员同志和工人，对敌斗爭应以团結群众、爭取群众为主，同时要分化敌人，孤立敌人。这就糾正了个别同志激于义憤，进行个人对个人的硬拚的行動，因而在复雜而艰苦的环境中赢得了对敌斗爭的胜利，打击和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壮大了革命力量。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組織在厂內象猎狗一样到处探听党员和进步工人的动静，并随时向日寇告密，迫害抗日革命力量。他們还公开地和日寇的密探队、汪伪特务組織串通起来，寻事生非。这就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目的。厂里工人在党的指示下，为了分化敌人，对日、伪、蔣分別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斗爭的方法。在日、伪、蔣之間制造矛盾，并向工人揭穿敌人的阴谋，依靠广大工人保护了革命力量。

一九四五年五月，苏联紅軍打敗了德国法西斯，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解放区軍民举行了大反攻。在强大的威力下，迫使日寇在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侵略者的失敗而宣告結束。八年来，日寇在碱厂的残酷統治，也就此告終。这是在党领导下歷經艰苦曲折和英勇斗爭所取得的胜利。

黎明前的战斗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

“接收”内幕

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了发动内战，一面“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一面则密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抗日军队受降。于是大批的汉奸卖国贼和国民党特务摇身一变，都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蒋、日、伪公开合流的丑剧出现了。

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向日寇展开了各种英勇的斗争。日寇投降以后，工厂本应归人民所有。曾经受日寇长期压迫、剥削，并向日寇进行英勇斗争的工人，应当成为工厂的主人。因此，工人纷纷要求澄西县革命政权接管工厂。厂里盛传着共产党来接收工厂的消息，大家高兴得难以形容，喜笑颜开地谈论着老解放区人民的那种民主、自由的生活，相互庆幸地说：“这下子可好了，大家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忠实地信守自己所签定的“双十协定”，在协定签字一周后，为了避免内战，挽救国内和平，撤出浙江、

苏南、皖南等八个解放区。

在国民党反动派所委派的“接收大員”尚未“接收”之前，工厂简直是处在真空状态。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那些为非作歹的日寇狼狽不堪地躲藏起来。留下的日寇管理人員也不敢問事了，希望能够安全归国。而工厂的工人、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为抗战胜利的形势所鼓舞，有的积极保护厂內的技术資料，有的认真地核对日寇編造的移交清冊，大家想把工厂好好地保全下来，不让日寇破坏一絲一毫。然而，因为日本厂长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密令，有恃无恐，非见国民党卖国政府“接收人員”的委任令不作移交。这时，也有一些工人对国民党反动派还存在幻想，认为不管怎样，中国人总要比日寇好些。

过了两个星期，厂里員工看到报纸上登載上海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要日寇发放疏散費的消息以后，全厂工人立即行动起来。大家在广场上集合，要日本厂长同样发給工人疏散費。日本厂长虽然有宪兵保护，但由于工人群众的强大的压力，只得答应在三日內发放疏散費。这时，厂里的技术管理人員还作为代表，到上海去和我们党所领导的上海两路（京沪、沪杭甬）員工会取得联系。

上海两路員工会是我们党利用伪路局某些当权者之間的内部矛盾，进行对敌斗争而組織起来的群众团体，其目的是团结教育广大的铁路职工，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因为在对敌斗争中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因而迷惑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还认为員工会是自己派系中的一个組織哩！

厂里員工代表，当时并不了解員工会的真相。他們回厂以

后，做了一些組織工作，并要工人推派代表出席筹备會議。当职工群众組織起来的时候，一些国民党特务、汉奸都乘机钻了进来，有些中統特务和汉奸也当选了，而真正的工人代表却没有选上几个。就这样，戚厂員工会被特务、汉奸把持了领导权。

一九四五年九月間，周楨(曾經当过忠义救国軍团长，外号“老道士”)帶了一批人来到工厂，进行非正式的“接收”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上海路局委派正厂长梁培根到厂正式“接收”。梁培根名义上是正厂长，但并无实权，主要是因为他有正牌工程师的头銜，在反动派看来，在假“民主”的招牌上还有可以利用之处。当然，他和周楨碰在一起，也只得装聋作哑，任其胡作非为了。

果然不出工人們所料，周楨到厂后，馬上大权独攬，操纵一切，并把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的工賊和原在戚厂的工头、領班等，以“复員工人”为名，分插到各个部門。如一貫騎在工人头上，压迫、剝削工人的周阿宝，軍統特务周来生、高其福、苏威根等，都被分任总监工、工头等重要职务。这时，从后方也陆续回来了一些复員工人。

“接收”开始了。“接收大員”到厂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倉庫，查点物資。原来日寇在匆忙中弄出来的移交清冊是很不詳尽的，这一点正合了他們的胃口，于是表面上是接管、清点，暗中却在留意哪些东西是帳外物資，是无帳可查的，价值多少，用什么方法可以盜卖出去。在整个“接收”过程中，贪污舞弊的风气弥漫全厂，他們一看见好的物品，就象蚊子见了血一样，釘住了不放。最使他們垂涎的，是日用品倉庫，至

于那些藏有銅、鐵、鋼、木料等的備品倉庫，最初他們是不高興“光顧”的，但是到後來，也被一掠而空。他們甚至公開雇了木工，用庫里的木料作私貨和家具。七、八個月以後，日用品和備品倉庫已經被他們“接收”一空，而且成為他們的賭博場所了。

在“接收大員”中，貪污手段最高明的要算機械工場的工頭顧泉生了。他比別人更清楚器材的價值，因此他們除了劫掠無帳的器材以外，一些貴重的器材，如金鋼刀、滾刀等等，都被他採用以次充好、冒名頂替的手法，換了出去。並且用這些盜劫來的東西，在上海開了月工廠，大模大樣地當起老板來。

至於周楨本人的貪污帳，那更是算不清的。如抗日戰爭勝利初期，汽油相當缺乏，廠里正好積存大批的汽油，就全被他盜賣掉。貪污公款，更是他的拿手好戲。不到三個月，廠里凡是能變錢的財物，都被他洗劫一空。後來貪污的漏洞大了，交不出帳，於是在一九四六年農曆正月半舉行“員工同樂大會”，將他獨吞掉的公款，借“員工同樂”名義頂上了帳。

“接收大員”到廠後的第二件事，就是出了一張禁止“欺侮”日寇的布告，並宣稱：如果因此引起任何事故，工廠概不負責。不但這樣，他們竟保護那些罪大惡極的日寇。象殺害過三十多條人命的日本工頭馬場，工人們一再要求把這個血債累累的屠夫處以極刑，給死難的同胞報仇。可是國民黨反動派卻是千方百計地庇護這個劊子手。他們一方面把他藏了起來；另一方面則調來了反動軍隊，用槍口對着搜索馬場的工人。後來，還偷偷地把這個殺人犯用小包車送走。

國民黨反動政府交通部中的總機廠系統，對威廠也非常

眼紅。总机厂的首領王嘉谷、王联芳(当时伪株州机厂的正副厂长)很想把工厂夺过去。可是，对于国民党交通部上海路局來說，机厂就是它的心脏，当然不肯放手的。經過一番明爭暗斗，結果还是上海路局局长陈伯庄的来头硬，戚厂沒有被夺过去。总机厂系統怀恨在心，从各方面找麻煩。例如，在分配日寇賠償的机器时，王联芳正好参与此項工作，因此戚厂就沒有分到什么东西。这件事說明：一些所謂“国家企业”，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內部各派系爭夺的肥肉而已。

“考工”真相

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戚厂后，新的灾难也临到工人的头上。日伪时期在厂生产的工人被污蔑为“汉奸”、“亡国奴”；裁員的风声也愈来愈紧。一些工人的“安居乐业”的幻想破灭了，惶惶不安的心情代替了“安居乐业”的幻想。

周楨到厂后不久，立即就拿童工、女工开刀，宣布：“童工女工，一律不用。”这等于給全厂工人迎头泼上了一盆冷水。一位工人曾經作了这样一首詩：

“世界和平”餓肚皮， 庆祝胜利停生意；

周楨赤佬不讲理， 卷卷鋪盖吃老米。

工人們常常私下里传播这首詩，借以发泄心中的憤怒。

童工、女工被裁以后，反动派便使出第二套詭計，公布了所謂“考工”办法。在表面上，“考工”的目的是甄別叙薪，工人凭技术报考工匠、帮匠、艺徒、技术小工及小工五种，而实际上却是借此达到任意裁减工人的卑鄙目的。在“考工”的公告里，

很明白的规定着：“复員工人不参加考試，仍以八年前資历雇用”；“为杜絕投机起见，考試不及格者，即予解雇”；“过期不登記者，以违抗命令論，即予开除”。

既然是凭技术叙薪，为什么复員工人不参加考試？显然，这是反动派的一个政治阴谋。他們故意用小恩小惠方式，拉攏一些复員工人，以便集中力量先打击原在淪陷区的工人，然后再对复員工人进行压服，以达到对工人实行分而治之的目的。

“考工”办法公布后，工人们很恼火，当即去找員工会，以要求复員工人一同考試为理由，酝酿罢考。

員工会执委会被汉奸、特务所控制，在員工会中的少数工人代表，虽然积极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但由于人少力单，难于成事，所以，罢考未能实现。

在考試之前，以“复員工人”名义随周楨进厂的工头、領班，通过自己的亲信向工人搜刮工人們的血汗錢。

再看看“考工”的内幕罢，国民党反动派真是卑鄙无耻极了！以机車工场來說，負責編考試卷的人，是原来騎在工人头上的日寇島村、平江（日伪时机車工场的头目），“考工”并不是按照考試成績来評定，而完全是以反动派私意来决定留用与否的。

再从“考工”的要求上看，更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如当时厂里有名的魔鬼机械工场工头顾泉生，在“考工”时所采用的实物样品，要七級以上的老师傅才能作得出，对一般工人，提出这样高的要求，显然是故意刁难，达到任凭私意来决定工人去留的目的。

在“考工”揭曉的那天，全廠參加考試的工人都集中在廣場上，懷着緊張的心情探問考試結果。國民黨反動派懼怕工人起來反抗，在廣場四周架起了機槍，如臨大敵。

“考工”的結果，全廠有三百二十六名工人沒有領到銅牌，被開除出廠。被開除的工人，並不是沒有技術的，在這批工人中，有的是對反動統治不滿，經常公開抨擊反動統治者的，有的是不願送禮給工頭的。只有氧氣工場工人劉仁官被開除後又進廠，却是唯一的例外。原來劉仁官搞氧氣機的技术很高明，因為沒有給工頭送禮，也被開除出廠，可是他一被解雇，氧氣機也就跟着“罷了工”。這使工頭、領班急壞了，只好由工頭去勸他進廠做工。劉仁官的例子，狠狠地給這些反動傢伙們打了一記清脆的耳光，揭露了所謂“考工”的真相。

辛酸的生活

“去了一個強盜，又來了一個賊！”國民黨反動派帶給工人的災難，並不亞於日寇。

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國民黨反動派來到工廠以後，採用狡猾、毒辣的手段統治工人。並且用特務、壞蛋來充當工頭、領班，指使他們為非作歹，使工人羣眾把憤恨集中到這些工頭、領班身上，以免危及他們整個的反動統治。

抗戰勝利以後，廠方繼承了日寇壓迫工人的抄身制，工頭們繼承了前任工頭所有的一切統治手法，變本加厲地對工人進行殘酷的壓榨。比如，打鐵工場的工頭王錫榮，利用幾名狗腿子拉攏了五十名青工和農民出身的工人，收作徒弟，結成

“无錫帮”；机械工场的工头拉攏来自上海、浦东的工人，結成“浦东帮”。他們利用帮会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則在自己的“小王国”里任意压迫和剝削自己的同乡。国民党反动派則利用这些工头、領班組織的帮会，蓄謀分裂和破坏工人阶级之間的团结。

那时工头对工人的剝削更是花样百出。有的抽头聚賭，有的乘貨币贬值的机会进行“标会”；有的以和工人合伙經營剧场、柴行、飯店为名，騙取股金；有的强迫他所管轄的工人在自己經營的飯店里包伙，进行剝削。工人如果不上他們的圈套，跟踪而来的就是失业和工作上的故意刁难。

工头有权对工人課处罰金。根据档案記載，当时有：“工作懶惰罰薪五天”、“不听指揮罰薪五天”、“工作時間口角罰薪三天”、“行为不檢罰薪三天”、“工作時間在机車內休息罰薪五天”、“賭博罰薪五天”、“借生病到医院游蕩罰薪五天”、“未放工即先行洗手罰薪一天”、“艺徒不守宿舍規則罰薪二天”等等规定。还有一个倚仗內綫而得宠的工程师“王癩痢”，更是任意地罰工人工資，工人們恨之入骨。

当时对工人威胁最大的就是停“生意”。在旧社会里，工人一旦失业，想要重新找到工作，就非常困难。有的失业工人被迫自杀。例如，当时厂里修配工场的青年钳工张耀庭，由于对工头的压榨表示不滿，被工头借故停了“生意”。张耀庭离厂以后，到处求人介紹工作，都沒有成功，在生活的压迫下，終于臥軌自杀。

反动派根本不重視工人的劳动保护，工伤事故不断发生，

工人受傷，輕的逼着上工，重的一脚踢開。廠里的醫院，把工人性命視如草芥。為了麻痺工人的反抗情緒，同時又可借端搜刮工人錢財，工頭們還利用部分工人的迷信思想。在工人發生工傷時，給出了神鬼招牌，說什麼“冤魂作祟”，搞什麼“打醮”。叫幾個和尚道士鬼混一番，說是“超度亡者”。說是從此可以平安無事。然而年年“打醮”，還是不斷出工傷事故，年年有人因工傷死亡。

在沉重的勞動下，很多人積勞成疾，但廠方毫無人性地規定病假“一月全薪，二月半薪，三月開除”。為了养活一家老少，工人們不得不硬撐着去上工。廠里機械工場鉗床老工人蘇安傅，就是被這個吃人的制度逼死的。蘇安傅有一手好技藝，他和妻子、女兒每天早出晚歸勤勞地干活，但是，收入總是不夠開銷，叫女兒出去拾柴，度着半飢半飽的苦日子。貧困的生活和沉重的勞動折磨着他，蘇安傅身體越來越壞，最後染上了肺病，病倒在自己的小茅棚里。工人弟兄們雖然經常接濟他一些，但是，對於七口之家來講，這又能解決多少問題？眼看三個月的病假期快到了，蘇安傅只好撐着一根竹竿去上工。他只在鉗床上干了兩小時，就口吐鮮血，倒在地上死了。工頭上來瞟了一眼，叫人把他拖進醫院去。過一會兒對大家說：“醫治無效，死在醫院里。”借此掩蓋真相，蒙混工人耳目。黃色工會主席聽到工場死了人的消息，都躲起來避不見面，結果還是工人們湊了一些錢，買了一口薄皮棺材，為蘇安傅辦理後事。但是那些工頭和黃色工會的壞蛋還不甘心，還喪盡天良地在工人拼湊起來的喪葬費中抽出一部分錢來，到街上大吃了一頓。直

到今天，工人們一想起老工人蘇安傳慘死的情景，無不對國民黨反動派切齒痛恨。

工人的日常生活，自然也是非常貧困。“篋笆泥牆，只遮太陽，風吹雨打，百孔千瘡。”就是當時廠里工人宿舍的寫照。由於房屋過於簡陋，火車經過時，屋架、牆身晃來晃去，就象馬上要倒下來一樣。工人宿舍曾經倒塌過一次，壓傷了不少工人和家屬。

那時工人工資本來低，然而，反動派還要用種種花樣剋扣工人的血汗錢，這使得廠里工人的生活水平更加降低。以材料場來說，發薪時間一般要比其他單位晚幾天，這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等於又給工人工資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這還不算，發下的工資盡是“大票包小票”，錢數總是不足。此外，工人還要負擔壯丁捐、軍柴軍米捐、碉堡壕溝捐等重重的苛捐雜稅。所以每次發薪，除去這些額外剝削，已所剩無幾，而物價又是一日數跳，這些錢只能夠買到極少的柴米油鹽。

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緩和工人群眾愈來愈強烈的不滿情緒，當時在廠里也曾搞過所謂“員工福利”，並大肆宣揚，美化工人的生活。其實，真正享受福利的，首先是福利站的副主任周來生，其次就是一些工頭、領班。東西一到，立刻就被他們先分配了，留給工人的不過是一些他們不要的次品和廢品；即使這一些，也不是每個工人都能“享受”。反動派搞的“員工福利”，本想是借此給自己抹點白粉的，結果是粉抹在鼻子上，變成了“小花臉”。大家都認識到“員工福利”是騙人的把戲，沒有人相信它。

在这短短的三年多的岁月里，粮价飞涨还經常买不到米，这个问题一直严重地威胁着工人的生活。尤其是在发工薪的日子，戚墅堰鎮上的米价涨得格外快。一到这天，工人家属就成群結队地在厂門口等着，接到亲人递过来的少得可怜的工資，立刻赶到鎮上去买粮。可是，跑到鎮上，米店已經換上了加价的牌子。工人家属从东街跑到西街，又从西街回到东街，来回奔跑，想用这些錢，多买一些米。可是，越跑粮价越高，有时一袋小鈔还換不到一袋米。操纵粮价的米蛀虫，可以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粮价，工人的生活真是“民不聊生”。

生产能力“增长”的秘密

前面說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使厂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車車輛修理制造工厂，厂房和机械設備方面都有所增添。可是，这些設備大部分都用于軋鋼、制造氧气、电石等上面，旧有的厂房多数未加修繕，损坏的情况很为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經計劃添建一座五百二十呎长、二百二十呎宽的橫式机車场，以便每月能大、中修机車二十一——二十八輛。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战，財源枯竭，无法实现这个計劃，只得利用日寇未完成的旧厂基改建成所謂机客車混合工场和机械(二)工场。

在机具設備方面，开始时，仅有“接收”下来的工作机械二百零四台和普通机械一百五十三台，加上給水和压风等不充

裕，工具鋼和風動工具不敷應用，電源有限等等，當時的生產能力也是可以想象的。

為了適應壓榨工人的需要，工廠的管理機構更加龐大了。當時設廠長一人、副廠長二人，分設技術股（下設設計繪圖室、材料試驗室、訓練系、檢查系），材料股（下設帳務系、材料系），事務股（下設文書系、人事系、庶務系、福利系），工作股（下設程序系、考工系、統計系），機車組（管理鍋爐工場、組立工場、機械工場），車輛組（管理客車工場、貨車工場），通用組（管理鑄工場、鍛工場、電機動力工場），設營股（下設公用系，并管理工具工場、修配工場、汽車工場、再用品工場、副營工場），另設會計室（下設綜核股、成本股、工帳股、出納股），直屬上海路局會計處，并受廠長的指揮、監督。據一九四七年六月份統計，全廠職員共二百零三人，其中除廠長、副廠長外，計有工程師四人、副工程師三人、幫工程師八人，工務員二十二名。全廠工人共二千九百六十八人，其中技術工人約一千九百餘人，半技術工人七百餘人，非技術工人不到三百人。

當時工廠屬國民黨京滬區鐵路管理局，全部收入均上繳給路局，支出亦由路局負擔，因此，無所謂什麼盈虧問題。在生產上沒有全盤計劃，只是承接上海路局及國民黨交通部的任務而已。正因為如此，它和民營的企業不同，只要有路局，只要有所謂機車車輛修理任務，它就能夠存在下去。

當時工廠的工作條件，與日寇統治期間，並無差別。一般工場的工作場地都是零零碎碎的，機器安排雖說經過了幾次調整，但仍極不合理。各工場的辦公室高架在工場角上，等于

監視工人的了望台。很多工人整天都在露天工作(如煤水車、放輪冷氣台、試車、司機室等修理工作)，夏天晒得背上起泡，冬天冻得手脚发麻、开裂。

尽管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生产停滞不前，但厂方編制的統計图表上却标明生产能力逐步增长。据档案材料：自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九月，工厂大修機車能力为平均每月四台，比抗战期間多一台；以后更逐步上升，一九四七年四月起，每月大修機車多达十台；同年十月客車修造成績最大，計大修四十一台，小修四十二台，改造三十七台，共計一百二十台；同年六月，貨車修造成績最大，計大修一百五十五台，小修八十八台，事故修及改造共三台，共計二百四十六台。

那么，这一时期生产能力“增长”的秘密又在哪儿呢？

原来，当时厂方虽然訂了一些所謂检修标准、修制限度之类的办法，然而却没有严格执行。特别是当时的厂长是由上海路局副总工程师兼任的，修造的機車纵然不合规格，如果他硬叫領出厂去，各机務段也只好照办。当时的副厂长兼工作股主任为了向上报功，只求縮短機車停留時間，全不讲求质量，所以生产能力就“增长”了。工人形容当时修理后出厂的機車情况是：“跑起来象銅匠担，停下来象餛飩担。”意思是說修理后出厂的機車，在运行时，象一副銅匠担，丁当丁当地发响；停車时，又象餛飩担，从上到下的漏气。有的工人将修理機車鍋炉比作“补大缸”。鍋炉上的裂縫小的焊上一层銅，大的涂上一层水泥，这样左补右补，补来补去，鍋炉就补得同“大缸”一

样了。

修理质量越差，进厂机车就越多，机车出厂率也上升越快，厂长的声誉也就越大，爬得更快。

由于美帝国主义加强对我国侵略，工厂在生产上的半殖民地色彩也更为浓厚。就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第二年，打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旗号运来的美国机车车辆涌进工厂。这批机车车辆中，UP客车的墙板、顶板和地板都即将烂穿，而且是用键子挂钩的，必须改成自动挂钩后才能勉强使用；即使修造好，最多用上一年半载，又得脱胎换骨地改造一番。另一些二轴车和四轴车，底梁薄得像纸，一装货物，底架就被压得变了样，横修竖改，总是不能充分使用；尤其是二轴车，只好回炉。尽管如此，这批破破烂烂的美国机车车辆却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担负了输送军队、武器的任务，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办工业的买办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附。

一九四七年，厂里开始建造新客车。其实只是将从美国运来的破货车上的底架拆下来，由木工在原有的棚车侧板上开八个窗口，钉上四排椅子，最后里外油漆一遍；或是将日寇留下来的比较好的三等客车挑出来，里外油漆一遍，换上二等字样，在脚踏架上钉上一块“戚墅堰机厂制造”的铜牌，也算是一辆新客车造好了。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份客车修造数字创造最高纪录的内幕。

工人们嘲笑国民党反动派这种冒名顶替的作法说：

物价上涨， 車子升級；
工人工資， 日少夜跌。

淮海战役大捷以后，解放军直逼江南，国民党反动政府南窜广州，运输既紧张又混乱。这时，国民党交警总局、护路司令部、青年军、陆军铁甲列车总队等一次又一次地将大量步枪、机枪、冲锋枪、步兵炮、摩托车、活动堡垒、装甲车送来修理。

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一次就交给工厂修理属于国民党陆军铁甲列车第二总队的战斗列车十七辆、轨道车二十辆。这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遭到歼灭性的打击，面临溃败。厂里工人庆贺解放战争的胜利，自然又不愿修理这些屠杀人民的车辆和器械，虽然国民党交通部会同国防部制定了所谓“整飭铁路员工服务纪律”的七项规定，厂内又布满了特务，但是绝大多数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都用罢工和磨洋工等方式，向反动派展开斗争，只有一小部分交修的车辆枪械出厂。

一九四八年，修车的实绩大大降低了。实际的生产能力是：机车大修四十五台，中修九十六台，事故修三台，改装一台，小修四十八台；客车大修一百六十九台，小修三百八十三台，事故修二台，改造四十九台，新造二十一台，重造三台；货车大修八百七十四台，小修一千一百一十七台，事故修十五台，改造十六台。与原订计划相比，相差很大。“生产能力增长”的谎话，掩盖不了生产实绩下降的事实。

在白色恐怖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工厂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老牌特务周楨、高其福、周来生等，一开始就以“接收大員”的身份出现。跟随他們来的，是那些被分插到工厂各个部門的把头、工賊。他們是周楨的基层力量。

反动派为了巩固它的反动統治，就連特务、汉奸操纵的員工会也不让它存在。反动派采用分化的手段向員工会进攻。在員工会的执行委員中虽然也有一些技术管理人員在內，但多数都是一些汉奸、特务，这些人是很容易被他們分化的。于是汉奸和国民党两路特別党部派来进行整理党务的党棍勾結起来，把一些执委拉进国民党，当上了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委員；只占少数的工人执委，由于不受反动派的收买，結果被开除出員工会。从此，員工会就完全成为黄色工会。

到了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不少真正由后方复員的工人陆续回厂工作了。由于一些特务、工賊、把头的阴谋挑拨，开始时，这些工人弟兄也对另一些工人弟兄产生誤解。然而，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当大家看到复員工人也同样的受压迫，甚至象机械工场复員工人还被赶出厂时，互相之間的隔閡也漸漸消除了，亲密地团結起来了。

敌人很清楚地懂得，工人阶级如果团結起来，那就会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堡垒。他們也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內部攻破的。他們想威震堰机車車輛工厂扼京沪鉄路的要冲，如果工人們团結起来举行罢工斗争，馬上就会影响到国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因此，敌人就用尽全力来破坏威厂工人的团结。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周来生操纵工会选举，组成了黄色工会，自己担任常务委员。他打着“工人代表”的招牌，开展特务活动，阴谋以特务手段控制全厂。他们先涂上了一层“复员工人”的保护色，在部分复员工人中发展反动组织“正气社”，挑拨是非，说“两路（京沪、沪杭甬）经过八年抗战，内部非常复杂，尤其是多数‘华铁’留用人员，最不可靠”；国民党中统特务逢忠仁、吴宝旗等也装出一副伪善者的面孔，以“参加有背景的组织与复员工人对抗”为名，欺骗工人参加中统，组织“忠社”。很明显，特务们挑拨工人之间的感情，其主要矛头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同时想在工人中制造派系，使广大的工人群众在恶势力面前，老老实实的干活。

在这一年里，厂内的国民党区党部也积极发展反动组织，并且无耻地威胁工人，要工人加入国民党。有些工场的反动爪牙还公开地强迫工人集体参加国民党，甚至把被开除了的工人也计算在内。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分化工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然而，觉悟了的工人，在阶级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得更紧，与反动派的斗争更坚决。相反的，国民党内部各个特务组织之间，由于争夺权利，却矛盾重重。一九四八年年初，军统特务高其福竞选伪立法委员，他手下的爪牙在厂内大肆活动，并通过一些工头、领班，把工人的图章收来，冒填选票，为高其福拉票。这件事使中统特务动了肝火，他们也派出爪牙，收集工人

图章，冒名頂替地写联名控告信，揭軍統的底。在黄色工会改选的时候，中統特务又拉选票，搶夺理事席位，密謀夺取黄色工会的领导权。經過一番活动，七席理事竟被中統特务逢忠仁等夺得了三席。軍統特务一看，臥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于是便以两路工会理事会的名义，給逢忠仁等戴上“共产党”的帽子，开除会籍，停止职务。逢忠仁虽然暂时受到一些挫折，但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里又被提为两路工会的整理委員了。

除了中統与軍統以外，当时横行厂內的还有“三青团”、“俠誼社”等反动組織。在淮海战役接近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区党部又組織了一个特务訓練班，培养特务骨干，准备垮台以后进行潜伏活动。

正如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在紀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們的强大和有生命，而是表示他們的軟弱和回光返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統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国民党反动派想在厂內建立特务統治，注定了非失败不可。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蔣介石一方面用尽全力向解放区疯狂进攻，一方面对其統治区內的革命人民施行血腥鎮压。白色恐怖籠罩全厂，留在厂內的革命力量，时刻都有遭受敌人摧残的危險。

一九四六年，党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分析了戚墅堰机車厂的复杂情况后，派黨員进入工厂。当时党既要在工人中間进行工作，启发和提高大家的階級觉悟，又要保存革命力量，因此斗争是相当艰苦的。

一九四七年，中共华中工委苏錫常工作委員會派一位黨員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廠工作，堅持對敵鬥爭。當時，知識分子和工人接近了，就會遭到特務的猜疑。因此，這個同志就先在和自己一同到廠的、受過學生運動鍛煉的同學中開展工作，後來便針對職工對膳食委員會不滿的情緒，從生活上來團結廣大職工，壯大進步勢力，擴大革命影響。一九四八年春，黨組織繼續吸收廠內進步工人入黨，於是革命力量在廠內生根發芽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五月，國民黨特務象瘋狗一樣在廠內亂竄，主要矛頭指向共產黨人，猖狂地進行了兩次大逮捕，妄想把廠內的革命力量一網打盡。一九四八年初，我黨在上海鐵路局的地下組織被叛徒出賣而遭到破壞，特務頭子看到黨的地下組織的力量強大，大吃一驚。於是中統、軍統等國民黨特務格外加緊對戚墅堰機車廠工人進行血腥鎮壓。

在敵人的眼睛里，凡是抗日戰爭時期到過蘇北或是曾經和共產黨有過聯繫的，都犯下了“滔天大罪”，輕則被稱作“不良分子”，行動上受到監視；重則被指為“共匪”，立即被捕，身受酷刑。

在第一次大逮捕里，俞寶琴同志也被捕了。她是共產黨員，在抗戰期間曾動員工人到蘇北去。這時，她雖然已經離廠了，但是國民黨兩路特別黨部仍然把她逮捕“歸案”。在審訊時，她理直氣壯地向特務問道：“鼓勵工人參加抗日，難道做錯了嗎？”特務們一時抓不到她的把柄，只好把她釋放。

最惡毒的是，特務們在大逮捕的同時，假意逮捕在抗戰期

間曾經參加過黨所領導的外圍組織——兄弟會的中統特務，假意地將他們送到上海，協助兩路特別黨部策劃逮捕工人的勾當。這些特務分子“被捕”後不久，就暗地里帶領着反動軍警到廠里分頭捕人，凡是比較接近黨，傾向於革命的工人，都遭到他們的嚴刑拷問。反動派就是使用這些陰險的花招，迫害進步工人的。

原受中共蘇中五地委領導的黨小組和一批工人，共二十餘人，也被捕了。在這次被捕的工人中，有劉仁官同志。敵人在捉到他以後，一口咬定他是“總頭子”、“大司令”，先用老虎凳壓斷他的雙腿，然後用大針刺他的指頭，又用熱酒從他的鼻子里灌進去，使他死去活來無數次，最後把他放進一個又臭又暗、又悶又熱、蚊蟲多得數不清的水牢里。但是，劉仁官同志的革命意志異常堅定，他牢牢地記住了黨所教導的：“投了紅旗，就不投白旗，必要時準備犧牲自己。”因此，他雖然受盡酷刑，但絲毫也沒有向敵人暴露一點實情。國民黨特務在審訊劉仁官同志過程中，用盡了酷刑折磨他，最後，還用“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和其他被捕工人一起轉到鎮江特刑庭。

敵人的這兩次大逮捕，並沒有吓倒工人，倒使廠里工人更清楚地認識了敵人的殘暴和兇殘面目，看到這是敵人死期將到的必然象徵，因此更感到鬥爭即將勝利，人民解放的日子不遠了。

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黨的鬥爭綱領越來越深入人心了。工人羣眾盼望解放的心情更是迫切。就在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進行大逮捕的同時，中共澄武工委也開始在廠內發展黨員，並成

立了党小组。接着，中共常州工委也在厂里建立了党小组。

在白色恐怖下，革命红旗依然飘扬着。厂里工人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更清楚地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政治觉悟大大地提高，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人群众大家都把心中的怒火烧向罪恶的反动统治者，不约而同地以磨洋工和浪费原材料的方式来与反动派展开斗争。有的工人是以最慢的车速和最小的吃刀做活，机器旁经常响起“五经魁，六六六”的谩骂声；有的工人则经常跑厕所，消磨时间；有的工人是采用“大材小用”的方式，浪费原材料；有的则是随意应付，该用大锤敲的，只用小锤敲几下，不应当拆装的，也给它慢慢地拆下来，隔几天再装上去。

这时，被转送到镇江国民党特刑庭的被捕工人，被强索賄金以后释放回厂了。他们通过“牢狱学校”的教育，革命立场更加坚定，阶级仇恨更加强烈。他们在牢狱里已经听到解放军快到江边的消息，知道反动派灭亡的日子快到了，明白只有通过斗争，加速反动派的死亡，广大劳动人民的光明的日子才会更快的到来。他们回厂以后，变得更加勇敢了，并积极地投身到斗争的洪流里去，以亲身所遭受的经历教育同辈的工人弟兄们。斗争的决心更大，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在工人中酝酿着。

二月大罢工

黎明的前夕，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以后，矛头直指江南，吓得蒋家王朝仓

皇南逃。上海、南京等地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垂死的反动派一面仓皇逃命，一面更加疯狂地实行血腥大屠杀。戚厂工人就遭到反动派的两次大逮捕，特务們在厂內象疯狗般地找寻目标，妄想将我革命力量一网打尽。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厂工人，在反动王朝向南逃命的要道——京沪铁路沪宁綫上，掀起了二月大罢工。

二月大罢工是以经济斗争为手段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它的导火綫是年終双薪問題。

一九四八年年終双薪，按照厂方当时规定，要分两次发給，第一次在一九四八年年底发，第二次在春节前发，而且是照阳历年底的生活指数計算。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当职工領到双薪国民党金圓券一千元时，只能买到二斗多米。这对在饥饿綫上掙扎的职工來說，是一个异常严重的威胁。于是全厂职工議論紛紛，人人不滿。經過酝酿，向厂方提出发給食米二市担的要求，以解决工人年关的生活和弥补年終双薪的不足。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黄色工会主席周来生到上海去与路局交涉。不久，周来生回来說，为了照顾职工生活，将二月份米代金提前在春节后发放，而对两担米的要求置之不理。所謂“米代金”是反动統治者榨取工人的一种手段。按照国民党交通部规定，京沪区铁路管理局每月中旬发給員工每人一担米貼，以上海三等白粳价格加一成計算。历来局方、厂方总是以公文周轉耽擱時日為借口，层层扣压。当时物价一日数涨，往往当职工們将米代金領到手时，只能买几斗米了。所以一提起米代金，职工們早就恨透了。

这时，厂内地下党员立即根据工人们的情绪和要求，分头进行工作，鼓动群众斗争意志，严密注意厂内外反动派的活动，防范反动派破坏。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华中工委苏锡常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厂内成立特别支部，加强对这个斗争的领导。

旧历元月初五日（二月二日），是节后开工的日子，可是谁也不愿再干活，形成了全厂性的总怠工。

二月六日下午四时，厂方宣布发放二月份米代金，每人五千三百九十元，这时米价已经超过八千元一石的大关，而且还买不到。大家提出：这不能作米贴，只作借支。大家拒绝领钱，而且聚集在总办公室门口。

二月七日早上，厂长召集工场（车间）主任开会，企图强迫工人领钱。他说：如果工人拒绝，就将这笔钱退回上海。厂长的诡计，大家是知道的；他想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来破坏斗争。党也采取了对策，发动各个工场的工人提出了五项要求：

- （一）此次米代金作为借支；
- （二）一月份仍照旧发双薪；
- （三）镇上无米可买，将厂内存米平均配发；
- （四）每月工资最低以三石米计算；
- （五）发给应变费、家属疏散费及救济米两石。

厂长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工人想出了更巧妙的办法，扬言：“既然米贴发不出，我们工人造出来的流线型客车倒值几个钱，可以推到上海去卖掉。”其实，大家是要把流线型客车推到车站正线岔道口，阻止南京和上海间的铁路运输，配合当

时的解放战争。工人们人多心齐，一呼百应，就把流线型客车推到车站正线岔道口，京沪线交通就这样被断绝了。大罢工开始了。

二月七日中午，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第六次客车，被阻在戚墅堰车站。车上的旅客对工人罢工深表同情，但要求让这次列车通过。经过协商，工人们看到车上的妇女、小孩很多，又饿又冷，同意让这次列车通过，但立刻通知戚墅堰车站站长：以后不准任何列车进站。

这时，蒋介石从南京逃往奉化，李宗仁继续玩弄假和平阴谋；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北平后，大军继续南下；国民党行政院南迁广州，京沪线上运输极为紧张。因此，戚厂工人用机车阻路的行动，使反动派大吃一惊。

厂方见事态扩大，愈加恐慌，被迫同意将这次米代金作为借支，并另发白米一斗，妄想骗工人复工，恢复交通。这时党提醒职工不要受骗，要坚持斗争，发动职工向厂方又提出了新的条件。全厂职工集中在车站，坚持斗争。

敌人开始了破坏、镇压罢工的行动。

特务头子周植听说工人提出了新要求，气呼呼的跑到车站，站在一堆枕木上厉声威胁道：“你们最近实在太不象话了。中间准有破坏分子，你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赶快回去工作！”

工人们用沉默来回答他，大伙儿坐着、站着，没有一个去理他。周植下不了台，气得象只疯狗，大叫大嚷：“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找一千只狗倒难，要招一千个工人可容易得很！”说完后就气呼呼地跑回去了。

傍晚，寒風勁吹，一輪新月，高掛天空。人們忘了寒冷，堅持站在站台上。忽然從常州方面開來了一列“烏龜車”（工人們把鐵甲車叫做“烏龜車”）。

“烏龜車”停穩後，窗口里伸着黑洞洞的機關槍，對準站在站台上的工人。

一個身體肥得象冬瓜似的軍官，走下車子，晃了一下那個老鼠腦袋，把手往後一放，吹着胡子就開了腔：“我是城防司令。你們為了生活，要飯吃，我是非常非常的同情！但是，大家老待在這裡，又冷又餓，也不是個辦法，你們推出代表來，鄙人願和代表一起商量。”

工人一聽，大家都喊了起來：“我們都是代表，要商量就在這裡講！”

這個飯桶司令知道自己的話露了馬腳，連忙改口道：“沒有代表也行。問題由我負責交涉，你們先回去。硬餓着肚皮也不行啊！”

“騙人！決不回去！”群眾一齊喊了起來。

飯桶司令一看軟功失效，把腳一跺，就來硬的，直着喉嚨下了命令。頓時機關槍“卡嚓”地上了頂膛火。司令命令站長發路簽，想強行通車。不上半小時，路東已顯出了白點，鐵軌上也傳來了嗤嗤的響聲，外揚旗也亮起了允許通過的綠燈信號。

白點已越來越大了，火車已完全清楚地看到了。雪白的頭燈，反射到站台上來，情況是萬分火急。這是一個緊要關頭，如果讓列車通過，就意味着罷工鬥爭的失敗。在站台上的職工想到：“千鈞一發的時刻到了，罷工決不能被破壞。”

共產黨員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首先毅然跳下月台，臥在鐵軌上。這一英雄行為，使在場的群眾受到極大教育，剎那間，工人全都臥在軌道上。開來的貨車停下了。

這一着敵人万万沒有想到，這位飯桶司令慌了，連忙鑽進“烏龜車”里，“叭”的一聲溜跑了。

臥軌鬥爭又勝利啦，人們對鬥爭勝利更加充滿了信心。

深夜十時左右，突然又出現了一個有四個跟班的軍官，大模大樣地走到人群中間。一個尖頭猴臉的小兵，嘶啞着喉嚨大喊：“諸位工友請注意啦，現在有我們上海路局警務處長向大家講話！”

這位處長叫錢鶴皋，早就來到這裡了，本來想用武力來鎮壓工人的罷工，他一看苗頭不對，就化硬為軟。他說：“工友們！我錢鶴皋到此是傳達局里的意思。王兆槐新任兩路局長，希望大家捧場。要求發一石米，一定辦到。我保證向局方建議，給大家滿意答復。希望大家也給我這個警務處長一點面子，大家回去吧！”他向大家掃了一眼，看工人們都沒動，又繼續說道：“希望大家相信我，要是辦不到的話，我錢某的头割下來給大家燒湯吃。明天十二時前給大家答復！”

錢鶴皋的“堅決”的態度，確實蒙騙了一些工人。黨組織明知這是敵人的詭計，但轉而一考慮，覺得硬拚也不是辦法，敵人既然來軟的，就來個將計就計。於是同意恢復交通，有策略地收了兵。

一夜很快地過去了，第二天早上，工人群集在廠內廣場上听取回音。廠方解決的辦法是：同意米貼作借支，不足部分

按本月十五日鎮上的米价补发，并允許將厂內存米每人发給二斗；其余条件要工人推出代表一同到上海請示，在七天內一定給予滿意答复。

自从这天起，全厂各工场和办公室都等于停止了工作，工厂处于瘫痪状态。

正当厂里工人停工等候厂方答复的时候，传来了上海工人响应戚厂工人臥軌罢工的消息：

二月八日《新聞日报》报导：“上海铁路工人响应戚厂工人臥軌罢工，今有千余人在‘紅房子’广场集合，沪宁車全部停頓……。”

二月九日《大公报》报导：“昨日下午二时正，……突然传来消息，謂戚厂工人已出发来沪尚路局請愿。路局‘紅房子’已聚集千人，并向办公室之員工喊話，要求一致罢工……。”

为响应戚厂罢工，上海龙头房、客貨車房、电厂、修繕厂、材料厂、印刷所等处的工人也先后宣布罢工。大大地鼓舞了厂里工人的斗争情緒。

十五日，期限到了，但是仍然杳无音信。工人们察觉到是受錢鶴皋的騙，怒火又一次燃燒起来了。

在党的领导下，罢工工人喊出了“到上海請愿去”的口号。

为了以防万一，工人们都准备了路上所用貨必需之物：有的准备修理鋪道的材料，有的在突击修理燒飯的車子。吃罢晚飯，工人们都紛紛涌向厂內，在老貨車車間門前的广场集合。

出发前，党組織作出決議：做到隱蔽組織，保存力量，积极参加斗争；通过外围組織把斗争推向高潮。一路上应做的

工作，也作了分工。

晚上，整个戚墅堰工房区响起了一片击门声、叫喊声。天气虽是寒冷，但是冷不了人们请愿去的这颗热心。

妇女们披着衣服站在门口，目送着自己的亲人，有的在向丈夫口袋里塞上几只大饼当干粮。唯有那些抱在妈妈怀里的孩子，什么也不懂，瞪着小眼，划着小手，望着这热闹的人群。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在“要吃饭就斗争”的吼声中，请愿列车开动了。为了保护工厂和照应在厂的家属，防止特务破坏，留下了消防队的人员，组成护厂纠察队。

列车在快到石塘湾车站时，发现了停车信号，列车只好慢慢地停下了。站长提着红灯，赶到机车旁，结结巴巴地说：

“无锡有军队，……用枪控制……控制着路签发送台，不能再往前开！”

工人们一听这个消息，顿时火冒三丈。

这个站长同情工人的罢工，为了保护他，工人们把他拉上机车当活路签，列车顺利地开出了石塘湾车站。

拂晓，列车降低速度，慢慢地驶进了无锡车站。

站上，大批武装军警，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好象面临大敌；把枪栓拉得嘩嘩直响。工人们毫无惧色。车子一停下，原来等在站上欢迎的工人，就一下子涌到车厢上来，和工人握手、祝贺。并告诉大家说：镇江、常州等地工人，知道戚厂工人要到上海请愿，他们也开着车跟上来。这更鼓舞了大家的斗争情绪。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路局副局长陈福海要来与大

家见面。

說起陈福海，厂里工人深知他的底細，早就恨之入骨，听說他来了，大家都警惕起来。

次日上午八点光景，从东面果然开来一列专車，后面还掛着两辆公务車。車子一进站，公务車厢里一下伸出了无数只手，向站台上的人群揮手、呼喊。原来陈福海的专車过苏州站时，苏州站早已聚集了数百工人，响应戚厂請愿罢工，一下子把专車包围起来，紛紛向他提出：要改善待遇。当工人们听說陈福海是到无錫站来和戚厂工人商量条件的，立即掛了两节車厢，有二百个工人跟来听取解决办法。苏州工人的来到，更增强了斗争力量。車站上沸騰了，人們竟忘記了现在还处子軍队的枪口威胁之下。

陈福海一下車，看见整个車站挤滿了罢工的人群，脸上頓时变了色。老狐狸还是强作鎮靜，把手往腰眼上一叉，摆出了豆腐架子，向工人說道：“为了生活，应该立刻給你們答复，但是資金的周轉和物資的供应都不能随心所欲，所以要有几天的耽擱，不过局长正在从各方面設法，一定給你們滿意答复。”

“哪个还相信你們这一套鬼話！”

“我們被騙够了！”

工人們的呼喊声压倒了陈福海的鬼話。

正当陈福海在“說服”工人的时候，西面又开来了一列車，鎮江方面的工人支援队伍赶到了。列車剛停下，后面又“鳴”地响起了汽笛，常州工人也赶来了。

四支强大的工人队伍把无錫站挤得风絲不透，階級感情

把他們紧紧地串連在一起。会师的工人 又是擁抱 又是握手，問長問短，真是天下工人是一家。

車站上响起了巨雷般的呼聲：

“我們要飯吃！”

“我們要生存！”

“不答应条件，决不罢休！”

圍在四面的士兵，被工人的堅強不屈的行動吓得呆若木鷄。

十二點左右，工人把所有的列車都掛上。共有五十多節車廂，用了三台機車。可是沒有路簽，車子沒法前進。怎麼辦呢？有个工人提起石塘灣車站站長當活路簽的事，于是一群工人連忙去拉陳福海，把他架上機車。汽笛長鳴一聲，一列長長的強大的工人請願列車徐徐地開出了無錫站。那些站在月台上的反動軍警，只好干瞪着眼，目送遠去的列車。

列車在飛奔前進！滄墅關車站，一閃不見了，蘇州站的外揚旗也隱隱約約地呈現在面前了。噠……噠……，機槍子彈突然猛烈地向列車橫掃過來，打得車輪、機車包皮丁當的响。司機理也不理，只是彎下了腰，車子猛沖過去。陳福海吓得臉色刷白，拚命地大喊：“不要打！我是陳福海！”其實反動軍警早已接到電話，知道司機室內有局長，他們向機車掃射，只不過想吓唬工人而已。

列車冒着槍彈繼續前進。突然發現前面有一面紅旗插在路軌中。這是危險信號。站在車頭上的工人，連忙告訴司機：“有情況，開慢車！”

一个急煞車，車子好像在一座无形的大山上猛撞了一下，停了下来，車头已滑过小紅旗。原来路基已被敌人破坏，再迟一会煞車，就要出軌，几千个人的性命难保。

整个苏州站都在反动军队的机枪控制下。天桥下也架有重机枪，并且还封鎖住破道口，不准工人搶修。工人们一看这种情况更是火上加油，一面押着陈福海，强迫他陪着工人一起去搶修被破坏的軌道；一面喊着口号，强硬地抗議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陈福海被工人押着要去修路，吓得面如白紙，张口結舌說不出話：“不——不能去，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这一“將軍”，果然把陈福海的办法将了出来。他愿意去和苏州城防司令打交道，設法让車子通过。一切反动派，最怕的是死。陈福海給苏州城防司令写了封信，军队撤退了。军队一撤，工人就馬上搶修路基。

阴险毒辣的陈福海看到工人斗争的意志非常坚决，便装着同情工人的样子，要求打电话給上海，要他們准备“迎接”。这时有些人放松了对陈福海的警惕，就由两名工人跟着他一起进了电话室。陈福海拿起話机說：“你是二四〇嗎？喂，我在苏州車站，工人决定来上海，他們到现在还没吃过飯，赶快准备三千只大餅欢迎……”

陈福海利用工人的麻痹，向上海路局发出了密报。

戚厂罢工，切断了軍事运输綫，給摇摇欲墜的反动政府打了一悶棍，反动政府大为惊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湯恩伯除了下令沿綫反动军队对工人进行镇压外，还派了参謀长曹汝珍坐鎮京沪管理局，密謀屠杀工人。曹汝珍和湯恩伯正在伤

脑筋的时候，忽然接到陈福海打来的电话。湯恩伯得到消息，馬上下令派军队乘火车开往真如站，駐守杨家桥；如果工人不听“劝导”，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处理，决不姑息。

“是！”

曹汝珍接受命令后，立即就去准备列车。誰知上海铁路工人响应了威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机车早就压了火，司机不知去向。曹汝珍赶来要机车，反而給工人报了信息。上海工人准备支援。曹汝珍找不到机车，改用汽车运兵，军用卡车不够，就征用市内的公共汽车。請愿列车在真如附近給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住了。

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拿着盒子枪，带着四个士兵跳上了机车，把枪对着四个人的胸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問道：“誰是陈福海？說！”

陈福海連忙把腰微微一弯，当官的就叫两个匪兵把他架下了机车。沒走二丈路，一辆奥斯丁的小汽车开来，陈福海钻进车子，車門砰地一关，就扬长而去了。

起先，工人群众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陈福海一溜，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陈福海叫“准备三千只大餅”的真相了，原来是要反动当局派遣大批军队，对付三千名工人的。

車厢里的人群騷动起来了。这时，领导斗争的共产党员，心里都很着急。同志們被隔絕在每节車厢里，联系不上。看样子反动派对工人的镇压已下了决心。

突然，上海方面发出一声机车汽笛的巨响：“嗚——”

“上海工人来支援我們了！”頃刻間，一片欢呼，人們的情

緒又翻騰起來了。

趕來支援的上海鐵路工人因為鐵軌被拆，不能前進，列車也被匪軍包圍，只能長鳴汽笛，表示聲援。

雙方汽笛聲此起彼落，久久不息。工人階級的一顆堅強不屈的鬥爭的心，緊緊地揉合在一起，這股力量，比鋼鐵還要堅強，再多的反動軍隊也是摧毀不了的。

汽笛聲直衝雲霄，它燃起人們的熾烈的鬥爭火焰，震動了敵人的心臟；它象徵着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也象徵着腐朽的反動政府的末日快到了。

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处長何龍慶和一些特務頭子都親自坐着汽車趕來。何龍慶首先下車，他代表湯恩伯來向工人“勸解”。他站在坦克上宣讀湯恩伯的戒嚴令：“……如工人不聽勸導觸犯戒嚴法令，由淞滬警備部遵照本部迭次命令辦理，不得姑息！”讀完後他接着說：“問題可以解決，你們先回去吧！否則就用戒嚴令對付，到那時就不可收拾！”接着，他又誘騙工人派代表和他們談判。

派共產黨員和進步工人做代表，那就上了敵人的當。

領導鬥爭的共產黨員，機智地指導工人群眾，把各個工場的工頭和領班推出去做代表。這些工頭和領班迫於形勢不敢不轉達工人的要求。深夜十一點，列車退至南翔站等候消息。沿站附近的農民聞訊後，不顧天氣寒冷，不怕敵人的刺刀威脅，把熱茶熱粥送上車來；在戚墅堰的職工家屬，聽說湯恩伯的軍隊包圍了請願列車，就拿着木棍、竹片，包圍副廠長周楨，迫使他開出救護車，給工人送來了干糧。這些，使全體職工受

到极大的鼓舞。

鉴于工人的斗争声势与日俱增，反动派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谈判在路局大厦进行，参加谈判的除路局方面和工人方面以外，还有军方人员。谈判结果：（一）员工待遇照电信局标准调整；（二）每人先借支五千元；（三）本月底发给每人食米五斗，以补年终双薪的不足。

反动派所答应的这些条件，虽则和经济上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达到了从政治上打击敌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南下攻势，鼓舞广大群众向垂死的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信心。

斗争胜利了。十七日清晨，请愿列车在欢呼声中凯旋而归。列车经过苏州站时，居民不顾警备部队的阻挠，向英勇的工人们致热烈的问候；进入无锡车站，欢迎的人群象潮水般地涌来，鞭炮不绝，锣鼓喧天。列车每到一处，都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振奋。它宣告：黑暗就要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护厂迎解放

一九四九年二月大罢工胜利以后，厂里的国民党特务，对工人的迫害更为猖獗，更为疯狂了。凡是被特务认为是“活动分子”的工人，都被列上黑名单，连一些平日只看一点进步书籍的职工，也在被监视之列。

这时，厂里的老牌特务周植、高其福等，和他们在—一九四八年年底集中训练的一批准备在解放前夕进行破坏、解放后进行潜伏活动的特务分子，散布出各式各样的谣言，污蔑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企图扰乱人心，在厂内制造紧张空

气，并煽惑一些对党認識不清的群众，跟他們去“逃难”。他們还打算在逃窜以前，在厂内进行破坏活动。因而，积极做好保护工厂工作，就成为解放前夕的一场尖銳的斗争。党组织首先对工人加强宣传教育，揭露敌人的阴谋，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采用个别交談、散发传单等方式，在工人群众中宣传胜利的形势和党的政策，安定了一部分群众的情绪，提高了护厂迎解放的斗志。

敌人要破坏，我們就要积极护厂。当时，在上級党组织的指示下，厂里党的地下組織提出了“厂是人民的财产，不能让反动派动它一分一毫”的口号，发动群众组织护厂队，积极布置护厂工作。在工厂各个重要部門如氧气工场、动力室、鍋炉房等处，均分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守护。在每一个大門、側門及缺口处都派有专人看守。在一些重要部門，都有共产党员在那里監視敌人行动，围墙上的电网接通了电流，預先组成的巡邏队沿着墙脚来回巡視，保护工厂的安全。对于厂方一些行政主管人員，地下党组织向他們发出了通知，責令他們負責保护人民财产；对于广大群众，地下党组织又散发了大批保护工厂和宣传城市政策的传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做好护厂工作。工人用查看铁路（当时反动派强迫铁路沿线居民轮番在夜間“巡路”）的机会，了解沿线碉堡的构造和匪軍的兵力布置。党派人記下全厂各个建筑物的方位面积，画成平面图；组织党员与驻在厂外的国民党交通警察打交道，了解交通警察总队的番号和人数，千方百计地摸清敌人在厂内外及铁路沿线的兵力、武器儲备等情况。此外，还组织党员和

积极分子熟习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的番号和军队的服装，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和为部队带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遂义正辞严地发布了进军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一声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东海边近千公里的战线上，在广大人民群众有力的支援下，浩浩荡荡，横渡长江，分段突破了敌人的江防。

四月二十二日，长江边的炮声不断地响着，由远而近，由疏而密。全厂职工的心中都在渴望着人民的军队早日渡江，使工厂早日脱离反动派的魔掌。

当天晚上，情况就起了变化。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压力下，守在江边的国民党军开始狼狈不堪地向四乡逃窜，沿途大肆抢掠，并准备破坏一切建筑物和工厂。这时候，厂里的一小撮反动家伙活动得更厉害，大造谣言、布置潜伏特务，甚至企图阴谋拆迁机器，破坏工厂。结果均遭到护厂工人的揭露和还击。

四月二十三日，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我们工厂新旧历史的转折点。

上午，顺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职工们为了工厂的安全起见，都把家属接进了工厂。这样，人多好办事，一方面可以互相照顾，同时也不怕坏分子捣乱。这时，步枪声、机枪声、手

榴弹的爆炸声夹杂在一起，越来越紧。厂里的工人纠察队和职工们更加加强巡逻护厂。此时，驻在厂门口“新更楼”宿舍那里的一支反动的交通警察中队，平时耀武扬威的欺压工人，可是就在他们切好肉、淘好米准备下锅的时候，一阵激烈的枪声立刻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地拔腿就逃。但是，他们逃不出我们南下大军撒下的“天罗地网”。

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铁路北面直向工厂地区追击，一列由南京逃往上海去的“九号车”正好给截住了。这列车装载的“旅客”，大都是双手血迹未干的反动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当他们一看到解放军截住列车时，那些官太太已经吓得抖索索地软瘫了下来。但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军官，仍然是执迷不悟，竟掏出枪来进行抗拒；于是，一场攻打“九号车”的激烈战斗就在工厂前面开展了起来。列车上的敌人以车厢当作工事，有的从窗口，有的伏在车底下开枪顽抗。一霎间，列车周围升起了一股股的浓烟，我们解放军的火力立刻压过敌人。列车里的一大串官太太，更是乱作一团，其中有嚎啕大哭的，有叫自己的丈夫逃命的，有呼儿唤女的，有拜佛念经的，真是丑态百出。有些顽固的家伙被解放军火力压得头也抬不起来，便向后爬去，想越过厂里的围墙逃跑。恰好，这正是自投罗网，他们一碰上电网，都触电而死。残余的反动军官见势不妙，自知已经无路可逃，始相继举手缴枪投降。不到一个小时，“九号车”的敌人全部解决了，解放军留下少数战士看押俘虏，部队就直冲工厂大门。

在威墅堰火车站的北面，另一支解放军部队也向工厂前

进。他们在站上遇到一小股企图顽抗的铁路警察，立刻就展开了战斗。这一些铁路警察是极其反动的，其中的两个路警在我们战士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喊声下，假意缴枪投降，当解放军同志冲上前去时，他们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我们的一个战士中弹牺牲了。路警的阴谋诡计更加激怒了英勇的战士们。顿时，密集的枪声又响了起来，那两个亡命之徒，立刻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残余的敌人在我军火力下掉转头就向工厂逃。这时候，解放军勇士们一边叫喊“缴枪不杀”，一边紧紧追击，决不让残余匪军漏网。这些路警拚命地逃到厂里老工房的夹弄里，钢盔戴歪了，呢制服也敞开了，“汤姆孙”枪倒提着，黄豆般的汗珠往下直滴。他们挨家挨命地打门，叫喊：“帮帮忙，请开开门，借件衣服！”工房区里没有一家理会他们。

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突进工厂。不久，两路大军在工厂前会师了，当即分头搜索残敌。反动路警们在解放军的包围下，相继都成了俘虏，工厂地区的战斗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枪声停止了。一瞬间，工房里的工人、家属纷纷涌出们来欢迎人民解放军。温和的春风吹遍了全厂，曾经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工厂到今天才真正见到了太阳。有的工人面对着久已盼望的亲人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有的工人高兴得和战士们拥抱起来。“工人同志！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解放军说的话使大家感到万分亲切、温暖。有的工人家属忙着送茶送水，不少工人都拉着战士的手亲切交谈，顿时形成一片

幸福欢乐的场面。

当日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工厂，工人们将预先写好的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彩纸标语四处张贴起来；同时，协助解放军解除了隐藏在事务室内的反动交警一中队的武装。肃清了工厂区内的公开敌人。工厂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作为京沪铁路心脏的铁路工厂开始由工人自己来掌管。

从此，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为实现工人阶级的伟大理想，自觉地积极地投入创造性的劳动。

